

252

4

2935

04-9835

WF 65

历史教学

Lishi Jiaoxue

3 - SEP 13
Copy 1960



一九五九年

11

中国现代史参考图片 (十六)

(新华社供稿)



1952年上半年，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这是对于资产阶级在建国三年以来向工人阶级和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的一个坚决的反击。〔图一〕1952年2月1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审大貪污犯大会上作报告（齐观山摄）

〔图二〕上海市店员在1952年2月7日举行五反运动代表会议。

（陆顺兴摄）

图一



图二

历史教学

· 月 刊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 (总第107期)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目 录

党的农业集体化的伟大胜利

——从天津地区农业集体化的过程看人民公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王常柏 (2)

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就我校一年来的成就驳“教育质量降低”论.....天津市第一中学校长 牟力 (6)

· 教 学 参 考 ·

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邱汉生 (11)

试论祖逖北伐.....赖家度 (16)

魏源“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和影响.....一宁 (22)

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看无产阶级早期斗争的发展.....健平 (24)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豁然 (29)

· 教 学 问 题 ·

“辛亥革命”一章的教法建议和教材分析.....北京女十二中 刘占文 (34)

我对中国古代史教学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江苏省苏州高中 陶念慈 (42)

· 问 题 解 答 ·

1. 明末苛重的“三饷”加派是哪三饷? 是怎样加派的?王瑞明 (47)

2. 1926年北伐时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的简单经过是怎样的?今 (48)

×

×

×

×

· 图 片 · 中国现代史参考图片 (十六) (封里、插页、封底里、封底)

| | | | | | |
|-----|---------------------|------|----------|-------|-------|
| 编辑者 | 历史教学月刊 编辑委员会 | 发行者 | 天津市邮局 | 定价每册 | 0.26元 |
| | | 订购处: | 全国各地邮局 | 预定价目 | |
| | | 代售处: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三个月三期 | 0.78元 |
| 出版者 | 历史教学社 (天津营口道79号) | 印刷者 |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 半年六期 | 1.56元 |
| | | | | 全年十二期 | 3.12元 |

本期印数0—80,900

党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伟大胜利

——从天津地区农业集体化的过程

看人民公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王 常 柏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短暂的时刻。但是，我们天津市的广大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互助组、初级社等发展阶段，于1956年春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合作化。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全民整风、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于1958年秋季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化。现在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已经一年了。全市一百八十七个人民公社和全国全省各地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热心的哺育下，胜利地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这一年是人民公社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伟大的一年，它已扎稳了自己的脚跟，走上了巩固健全发展的道路。

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广大劳动农民革命意志的集中表现。从它开始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深受广大劳动农民热爱。这是因为人民公社的建立，彻底解除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的社会基础，为全面发展生产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为广大的农民展示了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走向幸福生活的美好前景。广大农民把公社化的道路比作“上天梯”，把人民公社比作通往共产主义的“幸福桥”，他们说：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是“步步登高”。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证明了党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党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认为简单地回

顾一下我市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历史及其伟大成就是有意义的。

天津市的广大农村，大部分是老解放区。1948年前后就在占全市农村人口80%以上的地区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另有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地区由于解放较晚是在1950年前后完成土改任务的），推翻了封建地主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遭受十多年来战争破坏的我市农村经济，迅速地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土地改革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这还只是解放农民发展生产的第一步。仅仅有这一步，农业生产还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农民仍然不能彻底地摆脱贫困的境遇。因为土地改革没有解决土地及其它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没有改变农民个体经济的小生产状态。要想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想使农民彻底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新的阶级分化，还必须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把农民的小生产变成大生产，使农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逐步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农业逐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早在1943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组织起来”的名文中说过，农民摆脱贫苦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因此，毛泽东同志对当时解放区农村中出现的劳动互助组、变工队（毛主席当时把这种互助组、变工队称为合作社初级形式的一种）给以极高的估价。他认为这种生产合作虽然“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1943年10月在陕甘宁边

区高干會議上所做“論合作社”的講話)。

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組織，在抗战期間就有了某些发展，特别是自1949年我市大部分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各级党委领导广大农民大搞农业生产的同时，农业互助合作組織的发展加快了，到1950年全市参加互助組的农户已达到三十九万多戶(占总农户的24.5%)。在互助組发展的同时，有些地方感到互助組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就开始試办了三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名的献县(原饒阳县)五公村耿長鎖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在1944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当时虽然只有四戶，但已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极大注意。

1951年1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決議”以后，批判了某些干部对发展互助合作放任自流的偏向，明确了发展互助合作的重大意义，大大地推动了互助合作組織的发展，到1952年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四百零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互助組和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48.96%。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組織的发展，显示了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克服了很多农民在生产上經常遇到的劳、畜力不足的困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2年获得粮食总产三十九亿斤的大丰收，是与互助合作的发展分不开的。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加之各地已試办成功初級社的影响，很多农民对于劳动互助組的生产，已經感到不满足了，他們要求把互助組提高一步，要求組織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組織，于是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試办經驗証明：这种合作社虽然还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但是由于共同劳动，統一經營，因此突破了小农生产的限制，克服了互助組中集体劳动与分散經營的矛盾，便于統一計劃、因地种植、合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能够发挥劳力专长的积极性，因此，可以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据典型調查，农业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互助組15%左右，超过单干农民35%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生产的事实，吸引了广大的农民，他們說：“合作社比互助組好。”因而有不少农民要求办合作社。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公布，給了农民以极大的鼓舞。接着党中央于12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決議”，指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

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組織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根据我国的經驗，规划了改造的具体道路。这就是決議中所說的：“經過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組，到实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同时決議严肃地批判了安于小农經濟现状，而对发展互助合作放任自流的錯誤思想和作法。指出：“党对于改造个体的小农經濟，发展农业的互助合作，必須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而不能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否則“就一定会发展到放弃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陣地，帮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生长，因而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繼續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計劃經濟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中央決議的精神，我市各级党委加强了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到1954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七千二百七十九个，連同参加互助組的农户，达到占总农户的56.3%。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农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銳斗争。党内的某些同志在这个斗争中动摇了，他們没有看到广大贫农和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党的正确领导这些主要方面，只看到少数富裕中农的叫喊，因而他們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潑冷水，說什么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因而叫喊“赶快下馬，否則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这股右傾歪风虽然没有在我市普遍地刮起来，但是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发表了，批判了党内的右傾錯誤，規定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正确方針。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指示的鼓舞下，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揚起来了，于是，掀起了初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一万七千一百九十七个，并且出现了五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在生产上很快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同年(1955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四十亿斤，其它事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前进的，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党的任务就在于及时地改进和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社内部发生了产品分配与土地私有的矛盾。初级合作社土地分红的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一天天地明显起来。例如在一些办得较早的合作社里，土地报酬虽然不断降低，但是随着生产的增加，每个地股所分得的实物绝对数也在不断地增多。有些富裕中农只靠土地分红及其它生产资料的收入生活也就够了，因此，对参加集体劳动消极起来，甚至有个别的不再到社参加劳动。而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则感到自己出工多分红少不合理，因而要求废除土地分红。同时，土地的私有，也影响着农业社的全面规划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生产的发展日益受到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1955年冬季和1956年的春季，掀起了初级社升、并高级社的群众运动。有些原来参加互助组、甚至单干的农民，从实践中已经看到高级社比初级社优越，比互助组、单干更优越得多，因而越过了初级社，直接参加了高级农业社。全市农村就在这一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99.24%。小农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至此就完成了。

高级合作化的实现，消灭了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高级合作化的第二年（195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四十五亿斤，比1955年增长了12.5%。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农田基本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广大农民欢欣鼓舞，情绪高涨。

但是，留恋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极少数的党内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少数的富裕中农，互相呼应，乘1957年党内整风之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其主要锋芒之一，就是攻击农业合作化制度。为了使整风运动顺利进行，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党发动了伟大的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大辩论，并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广大农民，在这一场伟大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高度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有如原子弹爆炸一般，在农村中燃烧起来了，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1957年冬季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以往任何一年无法比拟的。然而，正是由于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所以人们感到高级农业社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了，广大农民从实践中感到要想改变我们这个地区长期贫困的面貌，必须大搞水利建设，改革落后的生产工具，逐步地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为此就要举办一些较大的基本建设工程和使用较大型的耕作和排灌机械。而单一的农业社不论组织形式、活动范围、人力物力都不能满足这个需要。同时人们为了迅速地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了有更大的力量向自然作战，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很多地方都打破了社界、乡界甚至县界，去实行共产主义大协作。这种大协作，到了1958年春天之后，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随着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兴建，更加广泛地发展了。大协作不仅创造了许多奇迹，而且也锻炼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人们越来越感到大集体力量的威力。于是，不少农业社开始自动由小并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人们要求把它推向前进。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要求予以极大重视。他发现了人民自己创造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便热情地予以支持。1958年8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一个巨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全市农村展开了，到9月9日，全市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原来一万零三百七十七个高级农业社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一百八十七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9%。这些情况说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人民公社这个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成立到现在，还只是一年的时间，但是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它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和文化，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巨大作用，已被实际生

活中无可辯駁的事实所証明了。

大家知道,去年公社化以后,馬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大丰收和大炼鋼鐵运动。在緊張的秋收、深翻土地和种麦期間,全市农村抽調了壯勞力二十多万人投入了采矿、挖煤和大炼鋼鐵。在各项任务如此繁重而公社又是刚刚建立的情况下,不但完成了大炼鋼鐵的任务,收了比1957年多得多的粮食(据最后核實数字統計,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五十一亿斤,比1957年增長13.3%);同时还完成了深翻土地一千四百万亩和适时播种小麦八百万亩的艰巨任务。可以設想,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要同时完成这样的繁重任务是可能的嗎?今年小麦收获面积虽然比1958年减少了二百四十五万亩,而且在小麦生长期內又較普遍地遭受了比較严重的干旱,但是总产量仍然和1958年大体相等,而单位面积产量却比去年提高了23%。今年的秋季作物除少数灾区外,普遍生長良好,丰收在握,預計全年粮食总产量可达五十七亿斤,比1958年增長11.7%,如果加上林、牧、副、漁等多种經濟生产,全年总产值可达十亿元以上,比1958年增長20%左右。这样的巨大成績没有人民公社是可能的嗎?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人民公社在短短的一年內,新建各种工厂六百八十二个;多种經濟生产的純利,到今年8月底統計达到了一亿五千七百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0%;在水利方面,一年来,修建較大水庫十处,小型水庫一百八十六处,改造坑塘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五个,蓄水能力达到六十三亿公方,修建各級渠道六万四千多条,排灌机械由1957年一千一百三十馬力,到今年8月增加到十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八馬力,农田灌溉面积由1957年的三百六十万亩扩大到二千零六十一万亩,大大地加强了战胜水旱灾害的能力;农村中广泛建立的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对于解放妇女劳动力、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

不但如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別、工农差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內职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民公社不仅是加速发展农村集体經濟和根絕資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且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广大的农民群众才热烈欢迎和拥护它,把它看成初升的太阳,看作幸福的源泉。

人民公社运动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嶄新的事物。所以“就不能設想它一开始就完善无缺,一点缺点一点困难也沒有。在公社化运动初期,由于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經驗,的确曾經出現过某些管理权力集中过多、分配上某些平均主义和某些浪費的現象”(周总理:“关于調整1959年国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但是这些缺点和成績比較起来,充其量也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这些缺点,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过去几个月的整社工作中已經得到了解决。在人民公社中“貫徹执行了分級管理、分級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在目前阶段公社的生产資料实行三級所有制,并且規定生产队一級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級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有小部分的所有权”(同上报告)。經過整頓以后的人民公社已經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

但是就在我們的人民公社已經克服了初期的某些缺点而走上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的时候,在我們党内却出現了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資产階級立場上,反对和攻击人民公社。說什么“人民公社缺乏客觀物質基础,并不是客觀必然性,而是少数人主觀愿望的产物,是少数人轟起来的”;說什么“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企图以此动摇我們伟大的人民公社。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以为他們的目的能够实现。与他們的愿望相反,广大的农民群众,以“人民公社实在好,幸福生活万年”的热情歌頌,回击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誣蔑和攻击。他們失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沒有听他們的話,相反却在这场原則性的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觉悟更加提高了,信心更加坚定了。他們在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发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伟大号召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高举着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紅旗,奋勇前进。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我們党对于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針政策及其所采取的

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就我校一年来的成就驳“教育质量降低”论

天津市第一中学校长 章 力

1958年，全国各级学校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教育战线上展开了深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教育革命以来，我校和其他各兄弟学校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教育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在革命运动中，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政治挂帅”已经成为学校工作、教育教学和学习的指导原则；学校大办工厂，师生参加生产劳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师生参加社会政治斗争，使学校和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基本上克服了学校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教育的面貌；通过教育革命，行政工作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办学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学校的办学原则，教师和学生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教学和学习的目的任务，工作学习的自觉性大大地提高了。这一些都为更好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教育方针为提高社会主义教育的质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教育质量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很明显，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一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教育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教育质量大跃进的一年。一年多以来，学生在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身体体质等方面都获得了全面的

提高。

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并深深地体会到，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教育革命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在教育工作中已经统治了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坚持这个原则。”（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前教育工作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完全放弃剥削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还牢固地盘据在他们脑子里。他们一有机会就向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吹送冷空气，他们随时随地想方设法去寻找教育过程中的“缺点”，以及所谓“学生文化知识质量不高”的例子，企图夸大缺点，否定成绩，达到否定教育方针，从而恢复“三脱离”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秩序的目的。目前，他们又在散布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教育“质量降低了”，攻击党的教育方针，企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他们这种论调已经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思潮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为了揭穿“教育质量降低”论者的谎言，打退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

正确措施，就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劳动农民要求改变贫困面貌而走上幸福道路的迫切愿望。同时我们也看到，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以及每一个具体改造步骤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也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击退了敌人的各式各样的进攻，克服了党内某些人的右倾错误，因而我们在这一场尖锐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必须知道，我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还要继续前进，还要把人民公社逐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便为社会生产力的髙速度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这是一个极其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在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的过程中，还会有曲折、有斗争。为了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记取历史的教训，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站在党的总路线的最前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为反动思潮的袭击，反对右倾思想；为了坚定贯彻教育方针、深入教育革命的决心，继续鼓足干劲，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更大跃进，认真地研究一年来教育革命的成就，摆出质量提高的事实，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我校的具体情况，教育革命的巨大成就和教育质量提高了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根本改变了学校教育的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便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事业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了使教育事业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党开始了对学校教育的系统的改造工作。对旧学校的改造，我校和其他兄弟学校一样是这样进行的：在党委的领导下，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放手发动师生群众。经过“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以及教学改革等运动，对学校行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思想都根据当前的政治任务进行了坚决较深入的改造；与此同时，还向学生进行了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这些改造以后，学校教育成为无产阶级手中的有力的工具，在历次革命运动中学校都参加了斗争，发挥了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革命的政治思想的作用，从而也提高了教育的质量。几年来，学校向国家各个战线上输送了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学生有许多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有的成了英雄模范人物。

虽然，在教育革命以前，学校教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这以前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内进行，1957年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以在学校教育工作队伍中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还很普遍，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传统还紧紧地束缚着学校的发展，阻碍着教育质量的提高。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为了进行教育革命，党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方针一出，一个以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教育革命运动中，我们在支部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政治挂帅，以“虚”带“实”、“虚实”结合的原则，放手发动师生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致经过如下的步骤：

第一步发动师生群众大办工厂。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部分教师，他们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而也反对学校办工厂。他们说：“学校办工厂弄乱了常规，学校不象学校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耽误学习，必然降低教学质量”。这种思想及其影响成为贯彻方针的主要阻力，不把它克服掉，群众便发动不起来，工厂也办不起来。为了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我们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了党和政府的有关教育文件，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经过几次辩论，大多数群众在认识上划清了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的界限，积极起来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掀起了大办工厂的热潮。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师生群众办起了钢厂、炼焦爐、耐火磚厂、活性炭厂等十余个工厂或車間，投入生产，投入全国的生产大跃进运动，支援鋼师升帐。学生写出了这样的新诗来歌颂当时学校搞生产、支援鋼师升帐的盛况：

天津一中一片紅，
鋼花飞溅映天空，
鋼师一見真高兴，
揮笔賜名“鋼一中”。

积极参加炼鋼的教师，这样总结他們的收获：
“爐内炼鋼，爐外炼人；鋼紅人也紅。”

工厂办起来以后，紧接着我們又在党委的领导下，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考虑到学生参加生产的工种尽量结合学生的文化知识情况（已有的文化知识和现在的学习进度），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征，将工厂进行整顿和提高，将生产、学习作了安排，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教育教学活动，使教育过程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学校办工厂，将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过程，解决了整个教育过程结合生产劳动的问题，而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教学领域有待解决。

第二步发动群众掀起教学改革运动。师生参加生产劳动以后，充分地暴露了脱离实际的片面知识的严重缺点，师生都感到自己的书本知识在实际生产中用不上，生产过程中有些现象和书本上的原理对不上号，从而激起了教学改革的要求。学生不满意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学习，教师也不满足于照本宣科的教学。党支部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集中了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搞教学改革运动。几万张大字报，数十场大辩论会，在揭露着教学中的“三脱离”现象，在破除着旧的“三脱离”的教育秩序。

教学改革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理解和如何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的問題，具体表现为教学过程如何“三結合”，也就是基礎理論知識教学与联系生产实际的关系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原则是第一坚持結合反对不愿意实行“三結合”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第二主張恰当的結合反对把理論与实际相割裂，輕視书本系統理論知識，主張把“系統理論化在生产过程中去講”的片面观点。經過辯論，教师明确了系統理論基礎知識的教学和“三結合”的关系，从而明确了本科教学的特点和目的任务，認真地改进了教学工作。

第三步，与教育过程和教学过程的改进相适应地改組了学校行政机构，改革了一些規章制度，从新改建了学校教学和生活秩序。

經過这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和学校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实行，人和人的关系变了，党领导下的、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教学相長的新的师生关系已开始建立。学校教育“三脱离”的現象也得到基本克服，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

“教育质量降低”論者，把这些革命活动叫做“破坏了教育的正常秩序”，把这些革命活动的結果叫做“降低了质量”。

“破坏了教育的正常秩序”，这一点他們是說对了。問題是我們破坏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正常秩序？资产阶级教育家們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专又白、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所需要的正是脱离生产、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教育，就是讀死书的秩序，我們正是破坏了他们这种秩序。而我們在破坏这种旧秩序的同时，則建立了学校教育結合政治、結合生产、結合实际的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秩序，現在正在进一步巩固这种秩序。这种新秩序正是我們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有科学知識、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所必需的。

至于“教育质量降低了”，那完全是謊言，下面我們談談教育质量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二 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了， 开始劳动化

貫徹执行教育方針，使得学校全体人員积极投入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使校內的斗争与全民的斗争密切結合起来，就很自然地引导大家都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并使大家在实际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例如，在学生中間，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建設成就，已經成为普遍的风气，进一

步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听党的話已成了絕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原則。这些情况是每个在学校工作的人，接触过現在学生生活的人都感觉到了。許多学生这样来总结他在参加斗争中所受到的教育：

“大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加强了紀律性，树立了集体观念”；“集体力量大，这句话在腦子中用生动的事实做了注解”；“自己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辯証观点都大大加强了”；“写日記，过去只是写怎样吃飯，怎样休息，而今天写的是火热的斗争，火热的生活”；……許多同学都以激动的心情談到自己这一年思想上的大跃进，他們把这一年，叫做“难忘的一九五八！”

学生还自觉地把学习和社会主义建設联系起来，学习目的发生了变化。在一个班团支部的总结里，有这样一段話：“同学们認識到中学时代所学的知識都是基础知識，不能忽視哪一門，現在多学一点知識对社会主义建設都是有用的。并且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和党的要求相距很远，需要更好地学习书本知識，和認真从事劳动，在实践中进行学习。”

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下乡下厂，接触劳动人民，改造了他们过去輕視体力劳动、輕視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巨大变化，这样就使他們在工农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有一位同学在日記里写道：“过去一听到劳动就皺眉头，現在一听说劳动就觉得又多了一个鍛炼的机会。我对劳动看法的变化也可能是一个进步吧。”大家都还記得1957年以前，学生对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看法是怎样的吧？同学輕視体力劳动，认为体力劳动最沒出息，在劳动中嫌憊怕累，看着穿褲衣服的工人就避开了走，甚至有个別学生怕說自己父母是工农的。現在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下面我想引用团委会的一段总结文字回答这个問題：

“同学们通过劳动和通过与劳动人民的接触，树立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同学们都以劳动为光荣，而对于不好好劳动的人在感情上产生了厌恶。很多同学劳动之后穿着褲衣服在馬路上走，觉得光荣，觉得高兴。同学们看到通过自己的劳动，高崗变成了平地，废料变成了成品，实际体会了‘劳动創造了一切’这句话。同学說：‘这句话說来容易，通过劳动才实际体会到劳动鍛炼了人，鍛炼了思想，也鍛炼了身体。’过去有同学认为农民是低級劳动者，接触了农民和农民一起劳动

以后，这些同学說：‘农民是最值得欽佩的劳动者，农民的感情朴实、直爽、真誠，是值得学习的。’工农被同学認為是有知識、可亲的人。在劳动之后，同學們都互相問自己象不象个工人，以象工人为荣，以做工农子女为光荣。

有一位同学，在过去一心追求旧知識分子的道路，經過到炼鉄厂劳动一个时期以后，亲身体驗到了工人同志們的實際知識之丰富，又看到他們耐心地教导別人，态度亲切；而个别大学生技术人员对知識一知半解，对实际缺乏了解，态度却那样的傲慢令人难予接近。看了这些，这些同学思想上也逐漸起了变化。”

学生由于对劳动的观点、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起了变化，从而也引起了人生觀的改变。过去不少同学追求只专不紅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道路，以資产階級专家为学习榜样，現在“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觀，开始以李兆珍（天津市劳动模範，現在天津大学学习）这样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形象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了”。

广大青年学生提高了社会主义覺悟，开始向着劳动化的方向迈进，这正是我們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要求，也正是我們教育質量提高了的重要标志。人，由于政治挂了帅，思想覺悟提高了以后，他就会在工作中进行革命。事实果然如此。学生思想覺悟提高以后，明确了学习目的，随着就要求改变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一位同学在談到貫徹方針以后自己的体会时說：“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針，学习的目的明确了，我認識到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設我們的祖國，使祖國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再不是为了个人而学习了”。由于学习目的的变化，随着便改变了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这就为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識的学习質量奠定了思想基础。实践証明，这一年多以来，学生的文化知識質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三 从片面的知識到全面的知識，从死的知識到活的知識

教育革命以来，学生的政治思想覺悟提高了，这一点是“教育質量降低”論者不敢也不能否認的，他們往往非难說：学生的文化知識的質量降低了。首先我們划清楚我們的文化知識質量标准和資产階級教育家們所謂的文化知識質量标准的界限。

“資产階級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認為，只有书本知識才是知識，实践的經驗不算知識”（陆定一：“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我們对知識的認

識則是，“一种是現成书本上的知識，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整頓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820頁）。我們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得到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陆定一：“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为学生开辟了获得实际的知識的道路，使学生获得生产实践的經驗，使学生的知識从片面发展到全面。据我校去年以来学生在生产劳动中获得的生產經驗，就高三一个年級的統計，就有：关于煅燒耐火磚、土法炼焦、炼鋼、机器另件鑄造等生產經驗；不少学生学会了生產管理的知識；学生还学到不少具体的生產技能。据約略的統計，从1958到1959年我校培养了和将要培养：車工330人，鑄工160人，汽焊工64人，錫焊工160人，鋼焊工32人，鉗工624人，装配工240人，噴漆工48人，內燃机修理工5人，司爐工304人，掌握化工基本工序的210人，电气安装工25人，木工80人，……在这些人中間少数的已經达到熟練工的水平。由于生产中实行技术革命的需要，許多同学广泛地閱讀了課外书籍，扩大了知識領域。請問，既有书本知識又有实际生產技能的学生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相比較，究竟誰的知識質量高？“教育質量降低”論者为什么不看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呢？“質量降低”論者也許要說：“我們指的是学生的理論知識的質量降低了。”現在我們再看看課堂教學和学生理論專業知識的情况又是怎樣的。

实践証明，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学生的理論知識質量也提高了，学习成績有了显著的上升。

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以后，对理論知識的学习，学生感到有以下的帮助：

参加生产劳动以后，有了感性知識，对理論知識理解得快了、深了，也記得牢了。一位同学在自己的学习总结中写道：“以前我学几何課，只考虑在丈量方面有用，現在才知道許多工业产品，許多另件都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参加生产劳动后我对几何的理解更深透了。例如我在建炼鉄爐时做过爐上的料钟，料钟是圆锥形的，做时先把鉄板板成一个扇形然后做成圆锥体。在立体几何課上，教师一提到圆锥时，我馬上想到了料钟；学到如何計算圆锥体的面积时，我回忆到做料钟的过程，对計算側面积公式便理解得很清楚。”許多同学在总结收获时，認為参加生产劳动后对物理、化学、数学的学

习都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了。物理教师也说：“学生在工厂劳动以后，都看到了车床工作的情况，有的同学还在车床上做过活。他们对车床的构造和怎样传动有了感性的认识，课堂上讲到机械传动时，他们对这部分知识很感兴趣，也比较容易接受。期末测验结果，学生对这部分知识掌握的很好。”

在生产劳动中经常要用知识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学生感到所学知识十分不够用，这就激发了他们的学习愿望；运用理论知识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看到知识的用处，自然就有了学习兴趣。

在生产劳动中感到由于所学知识不巩固、不明确而用不上，看着问题解决不了干着急，因此提高了学习理论知识的自觉性，加强了听课的注意力。

许多学生通过生产劳动，通过用知识解决生产中发生的问题的实践，培养了思考能力和手脑并用的习惯。

这些收获都为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因而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今年毕业班学生和去年毕业班学生在教师、入学成绩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毕业考试成绩发生了如下变化：去年初中毕业生八个班的试卷中对电路的画法及连接问题发生错误的达165人；今年毕业生八个班对同一性质的问题发生错误的仅25人。去年高三毕业生对于几何光学折射率这部分教材普遍感到难懂，测验时许多人发生困难；今年高三毕业生一个中等程度的班里53人中只有3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错误。

学生语文成绩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提高了。在阅读方面，学生对评价一篇文章首先能用“政治标准”看这篇文章的思想性，主题是否正确，然后再看表现主题的手法如何。过去学生看一篇文章主要看热闹，文章写些花草景物之类就觉得是好文章，而不管主题如何。过去学生作文两课时能交卷的寥寥无几，现在能当堂交卷的占百分之七、八十。

学生的历史知识质量也提高了。由于参加了生产劳动，和工农有了更多的接触，以及受到四个基本观点的教育，学生提高了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例如：在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对于因历史条件限制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一原因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听了工农讲课后，学生能用所听到的事例批判伯恩斯坦“阶级合作”论的荒唐等等。

考试成绩也有提高。

高中三年几何课的毕业考试成绩4、5分的百分比由1958年42.5%上升到1959年的58.25%；2分

的百分比由8.3%下降到8.25%。代数考试成绩4、5分的百分比由73%提高到77.73%；2分的百分比由6.5%下降到4%。三角4、5分的百分比由64.6%上升到80.33%；2分的百分比由3.9%下降为3.08%。物理4、5分的百分比由44.7%上升到55.5%；2分的百分比由17.8%下降到16.8%。考大学情况，考取全国5个尖端大学的1958年为26人，1959年为55人，考上一二类学校的由55%上升到60.8%。

其他各科及其他各年级各科成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以上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不是质量降低论者所能抹煞得掉的。学生不但在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方面的质量提高了，而且体质也大大地提高了。

四 学生的体质提高了

教育革命中，体育的课内、外工作大大地改进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者交替进行，使同学的体力、脑力劳动得到互相调剂；学校并积极参与了社会全民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这些因素都促进学生体质的增强。据一个年级的统计，劳卫制通过的百分比由1958年的67.2%上升到1959年的95.8%，免修体育的由9.2%降到3.1%。校医室门诊由1958年平均每日70人次降为现在的50人次左右。学生中几种常见的疾病已大大减少，如肠胃炎由1958年的25人降到1959年的11人，肺结核、失眠症仅偶有所见。

以上的事实，是仅就学生一个方面的收获做的粗略的总结；这一年多来教师的思想改造也更加深入了一步，收获也是很大的，在这里未加总结。但就是这些事实，已经充分说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革命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一批手脑并用、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新型知识分子正在成长起来。这是方向性的胜利。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不能不为这样的胜利而欢呼。可是“质量降低”论者被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蒙蔽了良知，对这些事实充目不见，充耳不闻，说什么“教育质量降低了”的梦话。睁开眼睛看看吧，“质量降低”论者。这一年，我们的体会，我们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教育方针，教育大革命，为我们在教育战线上开辟了贯彻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道路。让我们昂首挺胸，高举总路线的旗帜，高举教育方针的旗帜，在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教育战线大跃进，不断大跃进。

教 學 參 考

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

邱 汉 生

(一)

“四民月令”是一篇历史性的文件，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汉时期大地主田庄的情况。作者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崔家是涿郡的大地主，世世代代做大官。西汉昭帝时候（公元前86年至前74年），崔寔的先祖崔朝，就曾作幽州从事，后擢升为侍御史。崔朝的儿子崔舒，历四郡太守。崔舒的儿子崔发，王莽时，位至大司空，另一个儿子崔篆，为建新大尹（建新大尹，莽官，即千乘太守）。崔篆的孙子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后为大将军窦宪（东汉时期的外戚）的掾属。崔骃的儿子崔瑗，是有名的文学家，与马融张衡相友好，曾先后为外戚邓邰显所辟，后官至济北相。崔瑗就是崔寔的父亲。崔寔曾作五原太守，辽东太守等官，后召拜尚书。崔寔死于灵帝建宁中（公元168年至171年），已是东汉末叶，下距黄巾起义（公元184年）仅十多年^①。可见崔氏一門，从西汉中叶直至东汉末叶，虽然中间经历了改朝换代，但是二三百年来，一直是大官僚、大地主，社会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着的。这种情况，反映大地主势力的不断发展，不断上升。这，不仅崔家如此，翻检前后“汉书”“三国志”，同样情况，不胜枚举，如杨氏、袁氏、马氏、夏侯氏，等等。“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略，“天水旧有姜閭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天水如此，他郡可知。这种大官僚、大地主，成为地方上的强宗巨族。他们结交宾客，招纳徒附，自养家兵，豪横乡曲。地方守令，不得不辟

召他们的子弟做属吏。因而他们把持地方政治，常与中央政权相抗衡，以至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大家只奉行地方的政教命令，而把皇帝的诏令搁在一边。“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每诏书所欲禁绝，虽重悬惻，骂詈极笔，由（犹）复废舍，终无悛意。故里语曰：‘州县符，如霹靂；得诏书，但挂壁。’”^②而所谓“州县符”，实则均出之属吏之手。属吏常左右守令，成为实际上的地方守令，而所谓守令，则徒拥虚名，例如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暕。因此，二郡风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③可见功曹范滂成为事实上的汝南太守，而太守宗资只是签签字而已；功曹岑暕成为事实上的南阳太守，而太守成瑨只是安居坐啸，无事可做。

大地主势力的逐渐上升，是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东汉末方兴未艾。崔寔的“四民月令”正为这种历史趋势作了证明，在整个的历史趋势中展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横断面。“四民月令”的写作年代，应为二世纪中期。那时候，地方上地主的势力，已是十分强大了。

“四民月令”，所以说是反映大地主田庄情况

① 以上，均据“后汉书”卷8，崔骃、子瑗 孙寔本传。

② 崔寔政论，见“全后汉文”卷46，“州县符”，本作“州郡记”，据御览十三校改。“符”与“书”协韻，“霹”与“壁”协韻，这种交替协韻的例子，在东汉的风谣中是常见的，御览是。

③ “后汉书”卷97，党锢列传。

的历史性文件，乃是从它的内容进行分析考察的结果。如果按文字表面看，则“四民”乃指士农工商，月令乃十二月政事之所行，应为官方文件，其作用在组织四民的经济生活。“穀梁傳”成公元年：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礼记”月令疏引郑氏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但是，我们不能为这种文字表面所拘囿，而应从文件内容来考察。文件主要内容，在于说明：地主田庄的一年农业经济活动。这里，也结合着田庄里的家庭手工业经济活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是所谓“农”与“工”。地主又垄断文化知识，入太学、小学，就是所谓“士”；地主又兼经商业，黠贵糴贱，就成为所谓“商”。从文件内容分析，它事实上是以地主的生活为中心来写的，文件的第一人称是地主。

“四民月令”一卷，隋书和新旧唐书，均列于农家。“隋书”卷34，经籍三，“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大尚书崔寔撰”。“旧唐书”卷47，经籍下，“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新唐书”卷59，艺文志第49，“崔寔四人月令一卷”。可见，此书原只一卷，一向列于农家。“四民”称“四人”，乃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崔寔与崔湜，则“湜”字乃“新唐书”的誤字。今“四民月令”原书已亡佚，书中材料为各家所引用者，散见于“齐民要术”、“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岁华纪丽”、“御覽”等书，而大量引用，则为“齐民要术”。今日我们所据，则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严可均輯本。輯本分月排比，偶有前后复重，文字稍有变异，諒规模体例大体与原书相去不甚远。

(二)

现在，就“四民月令”的内容进行分析，具体叙述东汉时期大地主田庄的情况。

首先，在田庄里，大地主是聚族而居的。在一个宗族里，包括很多家庭，有的富裕，有的贫穷。宗族的首脑称作“家长”。在宗族里，有一系列的共同活动。这种血缘关系的特色，是古老的遗留。

“四民月令”里说：

“正月之朔，是谓正旦，躬率妻孥，洁祀祖禰，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注：“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以后，二月、六月、十一月，均祀祖禰，不列

举。）

“三月，……冬穀或尽，榘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纾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

“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十月，……五穀既登，家备储蓄，乃顺时令，救丧纪，同宗有贫窶久丧不堪葬者，则糾合宗人，共与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忿，无相踰越，先自竭以率不随。”

“冬十一月，……冬至之日，……进酒肴，及謁賀君师耆老如正旦。”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宾族，讲好和礼，以篤恩纪。……腊，明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賀君师。”注：“进椒酒从小起。”

从上引材料，明显地反映了大地主的宗族聚居情况和以血缘为联系的一系列的宗族活动情况。这些情况，大约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大家族里，有严格的长幼尊卑之序，所谓“室家尊卑”。卑幼者对尊长，要尽其礼敬，即令敬酒的次第，也有一定的排列。一年四季，重要的节令，都要向家长称觞举寿，还要装出一付“欣欣如也”的样子。（二）死了的祖禰和活着的家长，同样的被礼敬，而且两者是联系起来的，祭祖禰的时候，也就向家长敬酒修賀，祖禰是家长的神化，家长是祖禰的化身，以宗法的关系固结起来。（三）反映大家族血缘关系的，从横的方面看，有所谓“九族”、“同宗”、“宗人”、“宗族”等等。虽然称谓不尽一致，而内容并无不同，就是同宗的大家族内，实包括财产分开的许多家庭，而这些家庭，又在同宗的大家族内以血缘关系联系了起来。（四）同宗的人，有相卹相助之义。冬夏之交，青黄不接，则务施九族。九月始寒，又存问九族，施助寒衣。十月，五穀既登，则又帮助久丧不葬的贫窶同宗。在重大的节令，则召請宗族，讲好和礼。（五）但是，很重要的事实是，尽管以血缘联系着，并且以一系列的亲睦振卹活动粉饰着，而家族各个家庭，毕竟是“贫富”悬殊，经济上并不平等，另外，在血缘关系上，也还有“亲疏”之异。即在亲睦、振卹的活动中，也还有反对这种活动的“不随”分子。这就可以想象，尽管是同宗，但是既然贫富悬殊，则剥削和压迫是存在着的。但是，这一点在文件中并没有明显的反映。

(三)

其次，“四民月令”所叙述的大量农事活动，反映了田庄里的农业、林业生产情况。有关农事活动的记载如下：

“正月……上辛日，埽除韭畦中枯叶。……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漚，陈根可拔。急菑疆土黑墟之田，粪畴（注：畴，麻田也）。可种瓜，可种瓠，可种葵，可种藟、韭、芥、大小葱、蒜、苜蓿、及杂蒜，可种蓼。……正月尽二月，可种春麦、豌豆。”

二月……阴冻华泽，可菑美田、綏土，及河渚水处。……榆莢落时，可种蓝，别小葱，采术。昏参夕，杏华盛，桑椹赤，可种大豆。可种胡麻，謂之上时。可种慎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可种苴麻。可种瓜。”

“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椅箔籠。清明节后十日，封生薑，至四月立夏后，……芽生，可种之。是月也，杏华盛，可菑白沙輕土之田。可种慎禾，可种苴麻，可种瓜，可种胡麻，可种黍稷。……布穀鳴，收小蒜。桃华盛，农人候时而种。……是月也，……蚕晨尚閑，可利沟瀆。……是月尽夏至，煖气将盛，日烈燥，……可种粳稻。”

“四月，立夏后，……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謂之上时。可种胡麻，可种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可收蕪菁及芥、苳蔞、冬葵子。……茧既入簇，趣操剖綫，具机杼，敬經絡。……”

“五月，……夏至先后各二日，可种黍，……先后各五日，可种牡麻。……可刈蓝。可别种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六月，可菑麦田。六日，可收葵。……可种小蒜，别大葱、种冬蓝。中伏后，可种冬葵，可收芥子，可种蕪菁。”

“七月，……藏韭菁。别种藟，可种蕪菁，可种大小葱，可种小蒜，可种芥，可种苜蓿。”

“八月，……刈雀葦芻葵。……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唯穞早晚无常。可种大蒜，可种芥，种苜蓿，可种乾葵。”

“九月，……治場圃，涂囷仓，修竇窖。……藏苳蔞蕪菁。”

“十月，……农事毕，……五穀既登，家备儲蓄。”

“十二月休农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

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

从上引材料，反映了田庄里紧张的农事活动。从初春至岁尾，农事安排，十分紧凑。正月，地气上腾，就要菑田粪畴，种春麦春豆。然后逐月都有紧张的农活。秋收以后，农活略为少些，但是另有其他活动。十二月里，虽说“休农息役”，但是仍然有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等等活动。田庄里种植的有穀类，如麦、稻、豆、黍、稷，等；有瓜菜，如瓜、瓠、葵、韭、葱、蒜、生薑、蕪菁、芥等；有经济作物，如麻、蓝（可作染料）等。除种植以外，养蚕是一项重要的农活。也种植饲料，如苜蓿。农事活动里的生产劳动者是“农人”，例如说：“桃华盛，农人候时而种。”

跟农业相联系的植树种竹活动，也占田庄生产的一部分。“四民月令”记载：“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二月尽三月……可掩树（即压枝）”“十一月……伐竹木。”可见田庄里所种植的，有用材林木，如松柏；有经济林木，如桑、漆、桐；也有果木，如杏、桃、枣。

(四)

“四民月令”反映田庄里有多种多样的家庭手工业，其中主要的是治絲織帛，析麻織布。除了上文所引的有关养蚕操絲的一部分记载以外，关于紡織縫制等家庭手工业，尚有如次记载：“正月……农事未起，……命女工趣織布。……”“二月……蚕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彻復为袷，其有羸帛，遂供秋服。”“六月……命女工織絲練……可燒灰染青紺杂色。”“七月……处暑中，向秋节，浣故制新，作捨薄以备始凉。”“八月暑退，……清风戒寒，趣織絲帛，染綵色。……擗絲治絮，制新浣故。”“十月，……可析麻，緝績布縷，作帛履、不惜（即草鞋）。”从上引材料，我们可知作为主要家庭手工业的是治絲織帛，析麻織布。此外，有染色，有縫制衣服鞋子等工作。担任这些工作的，除养蚕的是蚕妾以外，織布織絲練帛、染色的是女工，縫制衣服的是縫人。这种蚕妾、女工、縫人，是奴婢。

在家庭手工业里，还有酿造。例如：“正月，……命典饋酿春酒。……可作諸醬、肉醬、清醬。”“四月，立夏后，可作鮑魚醬。……可作醋。”“五月，一日，可作醢（肉醬）。……亦可作醋。……可为醬，上旬炒豆，中庾煮之，以碎豆作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作魚醬。”“六月，

……可作麴。”“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取淨艾；六日饌治五穀磨具；七日，遂作麴。”“十月，……上幸，命典饋漬麴，釀冬酒。”这种酿酒、作醋、作醬、作麴，等工作，都由典饋負担，典饋当与蚕妾、女工、縫人等身分相当，亦为奴婢。在家庭手工业里还有农具、兵器等制造修繕工业。例如：“五月……煖气始盛，虫蠶并兴，乃弛角弓弩，解其微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箭羽。”“八月，……涼燥可上弩，繕治檠鋤，正縛鎧弦遂以习射。弛竹木弓弧。”“九月，……繕五兵。”“十二月，……合耦田器。”一方面，有繕治檠鋤、合耦田器等农具制造和修繕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張弛角弓弩、竹木弓弩，正縛鎧弦，繕五兵等兵器制造和修繕工作。在家庭手工业里，还有采制藥物等手工业，例如：正月“上除若十五日，合諸膏小草續命丸散法藥。”“二月尽三月，可采土苽根。”“三月三日，以及上除，可采艾及柳絮（注：柳絮治瘡痛）。……是月尽夏至，……作諸煎藥，……可采烏头。”“五月……五日，合止痢黃連圓，霍亂圓，采蔥耳（即蔥耳）取蟾蜍，取东行螻蛄。”“七月，……合藍丸及蜀漆丸。”“八月，……采王不留行。”“九月九日，可采菊华，收枳实。”“十二月，……炙簪（注：燒飲，治刺入肉中，……东門礪白雞头（注：可以合法藥）。”

从上面的所有叙述，可見田庄是一个經濟上完全自給自足的单位，从吃的、穿的、生产工具、武器、以至疾病医药所需，都不必外求。

(五)

为了培养統治階級的后备力量，地主重視自己子弟的教育。“四民月令”里記載了地主階級的文化教育活动。例如：“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經。硯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七月……曝經书……。”“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月……农事毕，命成童入大学，如正月焉。”“冬十一月……硯冰冻，命幼童入小学，讀孝經、論語、篇章。”东汉时期，地主势力发展起来，他們要求参加政治活动。为了掌握統治階級必需的知识，他們对文化教育有了迫切的要求。那时候，太学生徒多至三万余人，私人精舍和地方学校里的学生更多。紙已經发明，书籍的流通比較方便了。地主官僚用书籍作餽送的礼物。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奉书錢千为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书中所說的許子十卷，就是用紙写的，而不是用素写的。

的，素是絲織品，当即帛一类的东西。

(六)

田庄虽然是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的单位，但是大地主仍然兼营商业，藉以剝削农民。“四民月令”里有关商业活动的材料頗不少。穀物、布帛，綿絮，都买进卖出。

“二月……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收薪炭。”

“三月……可糶黍。买布。”

“四月……可糶穡（注：大麦之无皮毛者曰穡），及大麦、敝絮。”

“五月……可糶大小豆、胡麻。糶穡、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夏）至后，糶麴置罌中密封，至冬可养馬。”

“七月……糶大小麦豆，收綠絲。”

“八月……韦履賤好，豫买以备冬寒。……糶种麦。糶黍。”

“十月……卖綠帛敝絮。糶粟、豆、麻子。”

“冬十一月……糶秬稻、粟、豆、麻子。”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大地主經營商业的規律，那就是：（一）穀物登場的时候，他糶进，那时候，价賤。例如：四月、五月，是麦收的时候，便糶穡、大小麦、麴；十月、十一月，是大秋作物登場的时候，便糶粟、豆、麻子；秬稻。（二）穀物下种的时候，或是春天青黄不接农民乏食的时候，他糶出，那时候，价貴。例如：二月、三月，正当冬穀或尽，樵麦未熟，农民乏食，同时，黍稷正要下种，他便糶出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三）对布帛絲絮的买卖，也是如此。例如：三月买布，四月买敝絮，五月，收敝絮及布帛，都是乘农家刚下机，同时天气較暖，价賤的时候买进；十月，卖綠帛敝絮，則乘天气已寒，人家需此御寒，价貴的时候卖出。这样，大地主就从賤买貴卖中获取厚利，加重了对农民的剝削。大地主的这种商业活动，不是为了滿足自己生活上的需要，而是把从农民和奴婢身上榨取的剩余生产品通过市場的交换，以获取更多的財富。

(七)

大地主田庄的建筑情况，“四民月令”里有所反映。

“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籠。……蚕晨尚閑，可利沟瀆，葺治墻屋，修門戶，警設守备，以御春饑草窃之寇。”

“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

“八月……凉燥可上弩，繕治槩鋤，正縛鐙弦。”

“九月……治場圃，涂囷仓，修寶窖，繕五兵。”

“十月，培筑垣墻，塞向瑾戶。”

据上引材料，可見田庄的建筑，是环以沟洫垣一壘，外有門戶。中有蚕室、麴室，以及儲藏穀物、蔬菜的囷、寶窖。还有繕治槩鋤和五兵的小作坊。此外，有場圃，有果园、树林、竹林、菜畦、桑田、麻畴，和种穀物的大片农田。

这种田庄，从西汉至东汉，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在发展。“后汉书”卷62樊宏傳，記載了一个田庄的活的典型，可引以作証。这个田庄，是在公元一世紀初年，但是通东汉之世，它始終存在着。

“樊宏，……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課役童隶，各其得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給。……貲至巨万……，假貸人間数百万。……王莽末，义兵起，……〔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壘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欲攻宏营。”

东汉末年，仲長統的一篇文章里，对田庄，也有十分具体的叙述。虽然这只是仲長統的一种想望，但想望是根据现实生活的条件构筑起来的，因此，并不是空想。它也可与“四民月令”所叙述的互相参証。“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园树后。……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娛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踟躕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釣游鲤，弋高鸿。飄于舞雩之下，詠归高堂之上。”这样的一种田庄，在东汉末年，在很多地方都在发展起来。

(八)

必須进一步分析大地主田庄的生产关系。正如上文所指出，家“有良田广宅”的田庄主人大地主，拥有生产资料土地。樊宏的家里就有土地三百余頃。这种土地，是从兼并来的。仲長統說：“豪人之室，連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計。”所謂“膏田满野”。指的就是地主拥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情况。地主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

“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岁时令节，地主家里的妻妾裝飾得十分华丽。崔瑗的三珠釵銘說：“元正上日，百福孔灵，鬋髮如云。乃象众星，三珠横釵，摄髮钻瑩。”这正是“四民月令”所說，正月正旦地主躬率妻孥向家長称觴上寿时妇女的妝飾。

与地主阶级对抗的阶级是农民。在“四民月令”里，农民称作“农人”。农民是田庄里的基本的生产劳动者。“四民月令”說，“桃华盛，农人候时而种。”农民，与地主結成依附关系，被称作徒附。崔寔曾經指出徒附的来源。崔寔說：“土家累鉅亿之貲，戶地侔封君之土，……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戶崎嶇，无所跼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織，貧者蹠短而岁蹶。历代为虏，犹不贍于衣食。生有終生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一方面，农民被逼把田地交出，依附富人，率妻孥为富人服役；另一方面，富人就又控制了农户又控制了土地，故“戶地侔封君之土”。这样，許多农民就在長时期里逐漸成为富人的“徒附”。这种依附关系，不是及身而止，而是“历代为虏”。地主直接剝削农民的劳动，是当时剝削关系的特点。所以說：“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但是徒附也有自己使用的一块土地，仍然有自己的小經濟。所以說：

“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在崔駰的博徒論里，描写了农民的非人生活：“博徒見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黧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隴亩，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触热耕芸，背上生盐，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跼，蹄戾脛酸。謂子草木，支体屈伸；謂子禽兽，形容似人。……”崔駰从地主阶级的立場出发，借博徒的口吻，用“熊蹄”、“狼跼”、“禽兽”等語彙加在勤劳勇敢善良的农民身上，反映他对农民的誣蔑，但是其中却也写尽了农民触热耕芸，汗下如雨的辛勤情况。

在地主的田庄里，也有奴婢。縫人、女工、蚕妾、典饋等等，都是奴婢。他們的劳动主要是使用在家务劳动和家庭手工业劳动中。这在当时，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門。

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是“四民月令”里反映的基本阶级矛盾。关于这一方面，“四民月令”有最露骨的叙述。

“二月，……順阳习射，以备不虞。”

“三月，……是月也，冬穀或尽，樵麦未熟，乃順阳布德，振贍穷乏，务施九族。……

試論祖逖北伐

賴家度

祖逖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本文試圖將祖逖北伐的歷史背景和有關北伐問題的各方面：例如祖逖北伐時所面臨的北方形勢，祖逖跟東晉政權的關係，祖逖北伐進軍的功績以及其作用和影響等，依次略作論述。文中所談極其粗淺，錯誤之處希望同志們指正。

一 祖逖北伐的歷史背景

西晉惠帝永興三年（304年），占據山西一帶的匈奴貴族劉淵建立漢國以後，就逐步擴張勢力，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年）劉聰繼承了劉淵的帝位之後，即派大將軍呼延晏攻破洛陽，共殺晉朝軍民六萬餘人，并俘虜了晉懷帝，發掘晉朝陵墓，縱兵大掠，搜劫珍寶，焚燒宮殿，洛陽城市化為焦土。此後北方匈奴劉聰的勢力強盛一時，他們既然做為異族君主對北方漢族人民以及各族人民進行統治，就在一般的剝削壓迫以外，更加一層種族的壓迫。同時，匈奴貴族集團採用自己落后的部落制度強加于漢族人民，破壞晉朝原有的郡縣編戶制度，使用暴力驅掠各地民戶集中到平陽（今山西臨汾縣）附近，分配于各貴族將領的統屬下，以便榨取人民的勞役。例如永嘉六年（312年），劉聰驅掠關中士女八萬餘口退往平陽。劉粲攻敗晉軍于盟津，驅遷士民二萬戶于平陽。這樣戰亂飢荒之後，殘破僅存的民戶，經強迫遷徙，原有田園廬舍完全荒棄，生產遭到徹底的破壞，人民的苦痛更加沉重。當時少數

異族統治者高踞于廣大漢族人民之上，北方社會的階級矛盾迅速轉化為種族矛盾，漢族與非漢族間的衝突日趨激化。實証很多，例如永嘉四年九月雍州流民在陽南共推王如作領袖起義反晉，起義後流民嚴巖、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几，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匈奴劉氏）”^①。但就在同年十月，石勒軍南寇陽南各地，侯脫起義軍更堅守宛城，誓死抗擊石勒。又如永嘉五年（311年）山西流民集團號稱“乞活”，其中一支在部帥陳午的領導下堅決抗擊石勒軍于蓬陂（今河南開封東南）。另一“乞活”帥李暉投歸晉惠帝，受任做青州刺史抗擊石勒。永嘉六年（312年）石勒南侵江淮，不利，從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境）北退，“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②。這樣各地人民對石勒軍的憎恨和三年前石勒、王彌軍攻兗州、冀州各地時，“民從之者九萬餘口”^③相對照，當年流民曾響應過王彌、石勒的反晉戰爭，到此却堅決反對石勒，情況截然相反。我們不能說晉朝統治有所改善，只能從異族統治較漢族統治更為殘暴上獲得理解。

總之，永嘉五年洛陽陷落以後，黃河流域社會階級矛盾轉化為漢族人民反對異族統治者的種族矛

① “通鑑”卷87，永嘉四年九月。

② “通鑑”卷88，永嘉六年六月。

③ “通鑑”卷87，永嘉四年二月。

可利溝瀆：葺治墻屋，修門戶，警設守備，以御春飢草竊之寇。”

“五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箭羽。”

“八月，……涼燥可上弩，正縛鎧弦，遂以習射。”

“九月，……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凍窮厄之寇。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餼重，以救其寒。”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

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
 這裡，飢餓的農民被污蔑為“春飢草竊之寇”、“寒凍窮厄之寇。”但是農民在飢餓的時候，就被迫採取武裝鬥爭，進攻地主的田莊。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田莊里經常地設置警戒守備。地主修治門牆，製造武器，教練戰射，建立了反動的地主武裝。這種武裝，叫作“家兵。”地主一方面殘酷地鎮壓農民起義，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田莊所控制的農民採取一些小恩小惠的手法，進行分化。所以有時候又“休農息役”，“振贍勞乏”。這種手法，十分惡毒，

盾。北方广大地域农民生活更加黑暗悲惨，处处是“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①。人民正渴望着消灭地方割据，驅除异族侵陵，使社会秩序能够重新获得安定，全国政治能够早日复归統一，以便安居乐业从事生产。这是人民的要求，也正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历史环境也正是祖逖北伐时所面临的北方形势。

祖逖北伐是从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开始的，也是紧跟着石勒南侵軍从葛陂北退后的有利时机发动的。当时北方匈奴刘氏統治集团内部正在內訌。石勒、王弥、刘曜三支軍事力量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匈奴刘聰，实际他們已經相互紛爭、搶夺地盘。刘曜軍在長安附近和賈疋、索綝等晋軍相持，勝負未决。石勒軍和王弥軍在冀（河北省南部）兗（山东省西部）展开了混战，不久石勒吞併了王弥部众；但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县）的根据地尚未稳固。同时，北方各地反胡力量，在并州（山西太原）一带有刘琨軍，在厌次（河北乐陵）有邵續等軍，在洛阳以南有李矩、郭默等汉族地主武装，都是对祖逖北伐有利的客观条件。

祖逖在当年政治上的职位是隶属于晋潯阳王司馬睿部下一个軍諮祭酒，他是西晋末年流亡到江南的爱国者，具有恢复中原的壯志。他在对司馬睿建議北伐时，特別提出：“晋室之乱，……由藩王爭权，自相誅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誠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統主，則郡国豪桀，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②祖逖对北伐進军的战略分析，首先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北方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异族的殘暴統治，指出“人有奋击之志”做为北伐的前提。同时更充分考虑到北方新建立起来分散各地的坞堡地主武装的力量——郡国豪桀——的响应。并估計到

淪陷区一般中小地主阶级的人士，虽屈辱在异族統治下，但他們都怀抱着汉族政权能早恢复失地的愿望。祖逖把北伐胜利的前途放置在反侵略反压迫爱国主义的群众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祖逖更勇于負責，明确志愿要亲自出馬統帥軍事，表现出英雄豪迈的气概。

相反地，当时位居晋朝左丞相都督陝东諸軍事的司馬睿却是一个典型的高级封建貴族的代表，他和北方逃难到江南的大批豪門士族王导等联結在一起，企图割据一方，偏安江表。司馬睿在永嘉元年（307年）任职平东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駐鎮下邳，不久迁任安东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移鎮建康（今南京），位列藩王領有江南。到建兴元年（313年）时，司馬睿在江南势力相当稳固，所謂“荆揚晏安，戶口殷实”。实际上潯阳王府在建康已經形成了割据一方的政权。当时被匈奴刘曜軍所围困在長安的晋愍帝特派殿中郎劉蜀到建康詔司馬睿，“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万，徑造洛陽，分遣前鋒，为幽并后駐”^③。晋朝中央政府这一号令是适时的，但司馬睿竟“辞以方平江东，未暇北伐”^④，不肯出兵应援長安。显然，司馬睿在行动上一貫利用中原喪乱，藉以實現其貴族分权的政治目的。他对祖逖所提的“澄清中原，撫宁华戎”，統一全国的政治主張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

司馬睿对祖逖的正义呼吁不能公开反对，但却采取的是敷衍的办法，只任命“（祖）逖为奋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粮食），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⑤。这样，祖逖是既沒有兵卒

① “晋书”卷26，食貨志。

② “晋书”卷62，祖逖傳。

③ “晋书”卷5，愍帝紀建兴元年。

④ “通鑑”卷88，建兴元年八月。

⑤ “晋书”卷62，祖逖傳。

但是并不能掩盖他对依附农民剝削压迫的殘酷事实，这是很明显的。地主的殘酷鎮压，并不能吓倒农民，相反的，斗争是会愈来愈激烈。这在地主崔寔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收集的一首民歌里，就这样說道：

“小民髮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鳴。

吏不必可畏，从来〔疑当作民不〕必可輕。

奈何欲望平！”^①

在崔寔死后的十多年里，终于爆发了全国規模

的黃巾起义。“八州并發，烟炎絳天，牧守梟裂。”^②地主阶级受到沉重的打击。黃巾起义终于瓦解了东汉政权。

① 这首民歌，高中課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引用时，文字上作了修潤。

② 应劭：“汉官仪”。

又没有武器的奋威将军，在手无寸铁的条件下是无法进军的。另外，当时豫州地方在被石勒军蹂躏后，晋北中郎将刘演早已委任了张平做豫州刺史，张平是一个流人坞主，率领一支地主武装，筑军垒于譙城（今安徽亳县），原不受司马睿的调遣。所以“豫州刺史”的官职对祖逖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原先在永嘉时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乱南下，到达泗口（今江苏铜山县境），司马睿曾派人邀接，就地任命祖逖做徐州刺史；不久更调移祖逖做军諮祭酒，迁居京口（今镇江），这是司马睿对祖逖施用的收揽政策。但祖逖却“以社稷倾复，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或为吏所絏，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①。根据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祖逖在江南时是被贵族豪门所排挤的。

祖逖北伐的主张虽受到司马睿政治集团方面的排挤和冷遇，但为了恢复中原，为了有利于号召广大人民来支持北伐，他仍然接受了“豫州刺史”和“奋威将军”这个空头的官号，这在当时政治作用上也是必要的。建兴元年（313年）秋八月，祖逖豪迈地率领着自己原先亲信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船到长江中流，祖逖击楫誓众，宣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②。这是祖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忠勇奋发的声浪，同时对偷安苟活的腐朽贵族予以严厉的斥责。祖逖在群众中素存威信，因而信心百倍地奔赴北伐战场的最前线。

二 祖逖北伐军在黄河南岸的胜利

祖逖为了做好北伐的准备，遂驻屯在淮阴，平地建筑起冶铁炉场，铸造兵器，同时募集战士得二千人，编制营伍，由于得到北方人民的热烈支援，创立了一支健强有力胜任攻战的部队。就在祖逖屯驻淮阴时期内，北方局势更有了新的演变，石勒等集团的力量得到扩张，汉族政权在北方的重要据点已经基本上被异族统治者所摧毁，匈奴刘曜据关中以长安为中心，羯族石勒据冀州以襄国为中心，对扩大黄河流域各地残存的郡县村落，大肆攻掠，正所谓：“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饉，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③北方社会的纷乱，人民的苦痛，生产的破坏，是无法详叙的。当时石勒占据地区，“南

至盟津，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④，在北方势力盛极一时，已经形成了祖逖北伐军的劲敌。

建兴四年（316年）祖逖开始从淮阴向西北进军，他所遇到的问题，首先是黄河南岸各地的坞堡主。当时所谓“坞堡”是一种地主武装组织。他们结聚了宗族乡党和本地区的农民建立起坞、堡、壁、垒等防御工事以便自卫。依附于坞主的农民，一方面要给坞主服兵役，一方面要劳动生产。但因各地坞堡是分散的和孤立的，它的防卫力量很弱，同时耕种的田地拘限在坞壁附近，生产也很难发展，所以坞、壁仅是农民的暂时避难所。在永嘉乱后，北方各地到处都有这样的坞堡，例如永嘉二年（308年）“石勒、刘灵帅众三万寇魏郡、汲郡、顿丘，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⑤。又如永嘉四年（310年）“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⑥。到建兴时（313—317年）黄河以北的晋属的郡县或壁垒，已被石勒所攻略殆尽。黄河南岸，比较健强的坞主仍坚持反胡斗争。例如，匈奴刘氏攻占平阳，百姓奔走，共推李矩为坞主，东屯滎阳，“远近多附”^⑦。又如永嘉之乱河内人郭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渐众”^⑧。建武元年（317年）二月李矩、郭默联军抗击匈奴刘聪部将刘暢于鞮王故垒（今河南新郑境），李矩曾提出“凶胡臭羯，何得过庭”的号召，振奋部众反异族侵略的斗志。十二月，郭默曾率军进击匈奴到达山西絳县，刘聪所辖“右司隶部民奔之者三万余人”^⑨。足见河南一带坞主在反胡斗争上和人民是一致的，但因坞主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不足以抗御异族统治者大规模的侵略。建兴末年，河南坞主有的被石勒军事优势所震慑，正在依违于南北晋胡政治集团之间，观望成败。

建武元年（317年）祖逖军进抵河南时，汴水一带坞主有张平，樊雅等仍占据譙城，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张）

① “晋书”卷62，祖逖传。

② 同上。

③ “晋书”卷26，食货志。

④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⑤ “通鑑”卷86，永嘉二年十一月。

⑥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⑦ “晋书”卷63，李矩传。

⑧ “晋书”卷63，郭默传。

⑨ “通鑑”卷90，建武元年十二月。

平”^①，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割据集团。祖逖军到达蘄洲（今安徽亳县东）与張平、樊雅发生了冲突，相持一年胜负未决。当时祖逖和張平的政治地位——豫州刺史——是相同的，祖逖的军事力量也不能超过張平、樊雅等。祖逖要克服張、樊的抵抗就必需充分宣明北伐的民族大义，号召群众的协力，但祖逖北伐的威信尚未在直接击败强胡的战场上表现出来。祖逖在这样困难情况下坚持了斗争，首先争取張平部将謝浮，使誘杀張平。祖逖军因得进驻太丘（今安徽永城县西北），双方展开了搏斗，“樊雅遣众夜袭逖，遂入垒，拔戟大呼，直趣逖幕，军士大乱，逖命左右距之，督护董昭与贼战，走之，逖率众追讨，而張平余众助雅攻逖”^②。祖逖在紧急中必需求得外援，才能扭转局面，当时“蓬陂（今开封东南）塢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祖逖军击败樊雅，仍不能攻克譙城。祖逖更向南中将军王含求助，王含遣桓宣领兵五百助逖，逖军遂进围譙城。祖逖更遣桓宣“单马从两人”，往劝说樊雅，反复申说，“祖逖方欲荡平二寇（指刘曜、石勒），每依卿为援，……今若和解，则忠勳可立”^③，樊雅遂率众出降。逖军进入譙城不久，石勒遣石虎围譙，王含又遣桓宣率众支援祖逖，石虎军解围退去。祖逖因留桓宣参谋北伐，更奏表建康委任桓宣做譙国内史。

我们应该指出，桓宣也是一位出色的民族英雄，他先后在抗击石勒等的南侵，屡立战功，为东晋名将。他和祖逖的合作是建立在为捍卫民族利益而北伐的正义基础上。同时蓬陂塢的部众是并州流民“乞活”部的一支，他们保有抗击胡羯侵略的革命传统。祖逖军在譙郡的胜利是汉族反侵略的胜利。祖逖军团结了汴水一带广大群众，发展了新的力量，使石虎军知难而退。当年六月，司马睿特传檄天下称：“石季龙（虎）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将军祖逖帅众讨击，应时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军，銳卒三万，水陆四道，逕造贼塢，受逖节度”^④。建康方面这一次文告，仅是为了張皇其政治地位。在实际上，当祖逖从淮阴向太丘进军途中，建康方面运粮不至，逖军大饥。等到逖军进驻譙城时，司马睿立刻想来分享胜利的光荣。但数日后，司马睿又“召裒还建康”^⑤，充分暴露了司马氏贵族的腐朽本质。

三 祖逖对石勒斗争的积极作用

人民为了避免异族的殘暴統治，不得已投依到

地方塢主的壁垒里，忍受着严重的剝削和奴役，失掉平民的身分，成为私家的部曲。相对地说，农民宁愿忍受郡县官吏的統治；承担租調和徭役，做为編戶齐民；而不愿做塢主的农奴。因此也可以說，广大农民在异族营戶奴婢和塢主农奴之間，或者塢主农奴和編戶齐民之間，总是愿意选择后者。

当时祖逖北伐的历史使命是要求解除异族的压迫，变塢堡为郡县，恢复全国的統一。因此祖逖在豫州境内的行政对塢主的特权发生了矛盾。祖逖采行了争取各塢堡的下层人物。首先蓬陂塢主陈川的部将李头倾向于祖逖，陈川怒杀李头，李头亲党馮寵遂領其部众百人归附于祖逖。陈川更大怒，遣部将魏碩縱掠豫州各郡县，“大获子女車馬，逖遣將軍卫策邀击于谷水，尽获所掠者，皆令归本，军无私焉”^⑥。这一場战争，祖逖是站在晋朝政府立場上对塢堡主特权的斗争，結果陈川等塢主失败，祖逖救护了郡县被俘掠的居民，使归还原住家园，仍为編戶齐民，有力地打击了塢主们的特权，推行了郡县的行政。

太兴二年（319年）夏四月，陈川投降石勒，并献浚仪县（今开封）地，勾引石勒军南侵。祖逖亲率军进击陈川于蓬关，石勒遣石虎率兵五万渡河南助陈川，祖逖军退屯梁国（今河南商丘南）。石勒又遣桃豹率兵侵占了蓬关，祖逖军更退屯淮南（今安徽寿县）保持着军事上的实力。石虎等军遂俘掠了陈川部众五千余户，迁往襄国。这样就更显露出了塢主的弱点，人民迫切希望祖逖军北伐。

太兴三年（320年）祖逖军展开北伐战争与石勒军争夺河南各地。首先祖逖遣韓潛率军击败桃豹兵，夺得了陈川旧城的东台，但桃豹兵仍死守陈川旧城的西台，两军对垒，形成了祖逖和石勒战争的中心战场。六月，“祖逖将韓潛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潛居东台；豹由南門，潛由东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弃担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为逖士众丰飽，益惧。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鉄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屯东燕城（今河南延津县北），逖使韓潛进屯封丘

① “晋书”卷62，祖逖傳。

② 同上。

③ “晋书”卷81，桓宣傳。

④ “晋书”卷6，元帝紀建武元年。

⑤ “通鑑”卷90，建武元年六月。

⑥ “晋书”卷62，祖逖傳。

(今河南封丘县)以逼之。馮鉄据二台,逖鎮雍丘(今河南杞县)。数遣兵邀击后赵兵,后赵鎮戍归逖者甚多”^①。这样,祖逖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經三年多的战斗,終于將石勒兵从黄河以南豫州地区內清扫净尽,巩固了北伐第二阶段的胜利。

当祖逖軍击退了桃豹兵,“石勒又遣精騎万人距逖,复为逖所敗”^②。祖逖軍威既震,河南各地塲主遂皆受祖逖节度,如滎阳一带的李矩、郭默、郭芝等,洛阳一带的郭誦、赵固等,多“阻水筑垒,且耕且守,为灭賊之計”^③。郭誦曾大敗石勒將石生兵于堽坂。河南反胡軍事力量增强,影响于河北,例如祖逖軍“候騎尝获濮阳人,逖厚待遣归,咸感逖恩德,率乡里五百家降逖”^④,可見河北各地的塲主也都积极支持祖逖北伐反胡的斗争。

祖逖为了充分准备渡河北进,在豫州境内大力招撫流民,鼓励生产,儲积軍資。祖逖“躬自俭約,劝督农桑,克已务施,不畜資产,子弟耕耘,負担樵薪”^⑤。祖逖的亲密战友桓宣也是善于“招怀初附,劝課农桑,簡刑罰,略威仪,或載耒耜于輶軒,或亲芸耨于隴亩。十余年間石季龙再遣騎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为次于祖逖”^⑥。这一段記載是指桓宣屯軍襄陽的事情,但我們可以引來反映祖逖,桓宣等在豫州准备北伐时,依靠群众,鼓励生产的作风,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深厚的同情,是不同于一般晋朝官吏。正因为他們在北伐反胡的斗争上,依靠了人民的力量,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才能以不大的兵力几次打敗石勒的軍隊。祖逖在雍丘曾置酒大会,座中父老感激流涕,更作歌詞:“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可見祖逖的深得民心。

祖逖軍受广大人民的爱戴,正在練兵积谷,为取河北之計。威力远播,迫使羯胡統治者河北感到压力,从多方面表示让步。石勒对祖逖直接让步的行为是在太兴二年(319年),特令幽州修繕祖氏墳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知赵(石勒)施感恩,輟其寇暴”^⑦。尤其重要的是石勒对河北人民的让步,首先在太兴二年,石勒“均(蠲)百姓田租之半”,減輕对河北农民的剝削。太兴四年(321年)春,石勒更“散諸流人三万余戶,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撫之,于是冀、并、幽、……諸屯結皆陷于勒”^⑧。可見石勒为了緩和其統治下的人民反胡斗争,用释放流民的办法从消极方面瓦解了河北各地塲堡主們的屯結部曲;用減輕田租的办法从积极方面爭取了郡县的編戶。这充分說明农民的阶级斗争起决定性

的作用。此后,石勒遣使循行州郡,劝課农桑,北方經濟稍得恢复。另外,石勒对士族地主也施行籠絡政策,太兴二年石勒“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更“徙朝臣祿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并任用裴宪等做經学祭酒,任播等做史学祭酒,設置学校;又用續咸做律学祭酒,听理獄訟。太兴三年(320年)石勒使張宾做大執法,管理选拔人才,規定五品官人法;并令群臣及州郡官每年保荐秀才、至孝、清廉、賢良、直言、武勇各一人,分別授以官职。石勒在政治上重視士族,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较为突出,因而石勒时后赵政治頗見改进,为北方非汉族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道路。簡括地說,石勒对北方农民的让步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我們可以說,祖逖的北伐促使黄河以北人民对石勒的斗争发生了变化,有利于人民进步方面的发展。

太兴三年(320年),祖逖打敗石勒的軍隊,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后,为什么不迅速渡河北进呢?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是东晋政府对祖逖北伐不予支持;其次,石勒在河北势力漸趋巩固,祖逖只得暂时采取守势。事实上,祖逖一边派祖济、張敞、周宏等率軍修繕武牢城,加强沿河防禦,一面練兵儲粮,听任黄河南北岸民間互市,已經是:“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贍,士馬日滋,方当推鋒越河,扫清冀朔。”开展了北伐第三阶段的准备工作。

正在此时,东晋政权內部的紛爭发展到了內战的序幕。以王敦为首的軍事割据集团从武昌方面开始蠢动,建康方面晋元帝也急于調兵遣將,鎮压王敦的叛乱。太兴四年(321年)七月派戴渊做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守合肥,刘隗做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守淮阴。东晋境内大規模的內战阴云密布,駐軍河南銳意北伐的祖逖听到这些恶劣消息,“患有內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⑨。我們从祖逖北伐的过程上看,他一向遭

① “通鑑”卷91,太兴三年六月。

② “晉書”卷62,祖逖傳。

③ “晉書”卷62,李矩傳。

④ “晉書”卷62,祖逖傳。

⑤ 同上。

⑥ “晉書”卷81,桓宣傳。

⑦ “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⑧ 同上。

⑨ “晉書”卷62,祖逖傳。

到东晋统治集团的排挤、限制、打击和破坏，最后更派戴渊监视他，把他列于戴渊的统辖之下，行动受到限制，北伐受到阻挠。祖逖壮志未酬，悲愤万分，曾在病榻上暗夜里指着天空中的一颗明星长叹：“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①。祖逖的呼声紧密依恋着千百万爱国人民的心弦。不幸得很，祖逖就在太兴四年（321年）九月壬寅，“卒于雍丘，时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丧考妣，醵梁百姓为之立祠”。

东晋初年在河南一带北伐的军事力量，因祖逖病死，竟告解体。祖逖部众虽由其弟祖约代领，但因东晋内乱屡起，国力削弱，石勒军乘机南侵，永昌元年（322年）石勒军渡河破襄城、城父，更围攻谯城，“祖约不能御，退屯寿春，后赵遂取陈留、梁、郑之间，复骚然矣”^②。同时徐、兖一带，东晋守军节节南退，例如永昌元年，晋兖州刺史郗鉴被后赵石虎所逼退屯合肥。次年（323年）后赵军南侵彭城、下邳，晋徐州刺史卞敦、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在洛阳一带，后赵军南侵的声势更为猖狂，从太宁二年（324年）后赵派石生、石聪南寇许昌、颍川，“俘获万计”。石生又进攻李矩、郭默，李矩等屡败。太宁三年（325年）郭默弃军南奔建康，李矩“亦帅众南归，众多道亡，惟郭诵等百余人随之”，走到鲁阳李矩堕马伤死，“于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③。

在祖逖死后三、四年间，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尽遭石勒侵占，人民重陷于异族统治之下。东晋政府内部腐朽反动的统治者是负有极大罪责的。

四 結束語

我們遵循着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初步考察了有关祖逖北伐的史实，并探求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本质，我們

得到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群众运动的产物，它的成功或失败是取决于他的实际活动的方向对人民利益是否结合或抵触。我们认为祖逖在东晋初年是最卓越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北伐进军中是站在人民群众的行列里，克服了极其困难的政治、军事条件，渡过了饥寒交迫的长期岁月，坚持了北伐的正确方向。第一，祖逖依靠人民反抗异族落后统治的斗争，有效地抵御了石勒军的南侵，保卫了江淮以南汉族较高封建文化的继续发展。也可以说，祖逖北伐的胜利给以后东晋淝水战胜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先路。第二，祖逖以豫州为中心展开了生产斗争，使黄河以南残破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好转。祖逖同将领士兵们为了充实北伐的人力和物力，耕耘樵薪，发扬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作风，实践了与群众同甘共苦、忧国忘身的光辉革命传统。第三，祖逖在民族斗争中完全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他的一切行为表现出当时汉族文化先进的特点，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能用事实给落后部族的统治者以坚决斗争，使其遭到抗击而不得不有所让步，羯族石勒当祖逖北伐时期在冀、幽、并等地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从多方面采取了汉族较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制度，因而北方社会生产一时有所改进，各民族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石勒的让步是和以祖逖为首的广大人民反异族统治的斗争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祖逖军北伐对于促使北方汉族与非汉族各民族间走向融合——在阶级社会时代，其道路是很狭隘的，进度是很迟缓的——的道路，曾经起了不少的积极作用。总之，从以上史实里，我们更明确了历史上任何卓越人物的进步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前进力量必需是一致的。

① “晋书”卷63，祖逖传。

② “通鑑”卷92，永昌元年十月。

③ “通鑑”卷93，太宁三年六月。

更正

本刊1959年6月号第23页注①“明史”应为“明纪”。又同期第25页左栏第十行“……兼理税务礼监太监”一句，应为“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

魏源“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一 序

魏源(1794—1857)是中国近代史初期的先进思想家之一,是正式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又热心研究当时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家,是具有丰富学识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有:古征堂内外集、圣武记、海国图志、春秋繁露注、孔子年表、孟子年表以及其所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等。其中“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最为人所推重,其子魏耆撰“魏府君事略”时,曾全录二书之序。二书以“海国图志”最能代表魏源思想中的先进部分。“圣武记”书中虽反映其遭受外侮要求振兴的反抗侵略的进步思想,但,同时又反映他憧憬与缅怀清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的“武功”和“盛世”的反动思想。

“海国图志”的写作,据魏耆“魏府君事略”载称:“丙午夏,以母忧去官……以前年英夷议抚,当事者为其冀远,不谙底蕴所致,遂于读礼之暇,搜揽东西南北四洋海国诸纪述,辑海国图志及轮船机器各图说,成六十卷,以资控制。”据此知是书当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遭母丧守制之时;惟图志自叙则署称:“道光二十有二载岁在壬寅嘉平月”,后左宗棠为重刻本作序时也沿称:“海国图志六十卷成于道光二十二年。”

若从书中记载内容及成书毕竟需要一定时间看来,似可作这样的推断:“海国图志”可能始撰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而大约完成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先后历时四载而成书,用力不可谓不勤。后又因搜集到新资料而有所补苴,于咸丰二年(1852)又成四十卷,合共一百卷,即今本之“海国图志”。

魏源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由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而悲愤陈言,即自叙中所称:

“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排,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其二,不仅愤排,还要提出具体办法,即自叙中所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种思想不是单纯的介绍,而是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然后用它来和外国人办交涉、打交道,甚至抵抗侵略,这与以后洋务派所标榜的“以夷制夷”应是截然不同的二件

事。

“海国图志”的材料来源,据自序称:“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是此书除林译“四洲志”为基本根据外,还辑录了若干种中外著述。据书中现所征引者,西人著作有“职方外纪”、“万国地理全图集”、“地理备考”、“外国史略”和“每月统纪传”等;历代史志有“后汉书”、“新唐书”、“宋史”和“元史”等;私人著述有“庭闻录”、“海国闻见录”、“稗海纪游”、“海镜”、“瀛寰志略”以及其个人的其他著作如“圣武记”和“西藏后记”等,总共约达五十种以上。除此以外,魏源还从一英国俘虏口中直接了解情况录入书中,如卷五十三所收魏源“英吉利小记”即系魏于道光二十年为友人邀至宁波军中亲询英俘安突德所记的梗概。魏源把各种材料分国系属,颇便后人进行研究与参考。书中除文字外,还有舆地图,包括沿革图和各洲各国图,反映了当时一些学者对地理知识了解的程度。

魏源以前,也有些人撰述过异域史地的书,但魏书自有其特点,据其自叙称:“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魏源介绍和采择了西洋人著述中有关西方史地情况的记载,比一般得之于传闻式海行纪程,自然会完备和充实些,这就使“海国图志”比其他同类性质诸书更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

“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大致归纳为如下点:

(一)魏源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首先,他提出了初期的“维新”思想,要求学习西方以改变自己。魏源曾因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而具有一种爱国的悲愤情感。他很激动地要求知己知彼以达到“制夷”的目的。要求一改过去昏聩和虚骄的积习而去努力学习和变革。因之,他是以爱国思想为基础而表达自己维新主张的。他在书中介绍了中国人的一些关于仿造船炮的议论(卷八四),同时又介绍西人关于鎗炮轮船和火药的图说(卷八五一

九三），其目的为使学者有所借鑑。他要求自己能造、能用，并进而要求注意到“物”以外的“人”，要注意选兵、练兵、养兵。其最终目的是“不必仰賴于外夷”（卷二）。这是魏源进步思想的一种发展（在“圣武记”中魏源尚主張“造炮不如购炮”）。不但如此，他还注意到政治制度的借鑑，在“后叙”中提到“至美利加北洲（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这在封建社会的当时来说，这样正面提出政治主張确是一种大胆的行动，也是一种可贵的表现。其次，他又提出反抗外国侵略的思想，针对清朝衰弱的现状，制定了一整套对策——所謂“議战”、“議守”、“議款”（即“議和”）。在“議守”中又提出一套对付外国侵略的抵御办法，即“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約，守正不若守奇、守闊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卷一），并以三元里之胜利来論証其論点。魏源坚决主張蹈敌之虛，实行内地陆战。他与林则徐同样地从鴉片战争的實際中观察到民力可用，如在“卷一”“議守下”曾一再申述說：“广东之斬夷酋、捐夷親者皆义民。两擒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舶于南澳者，亦义民”。“及夷兵淫掠，激民之怒，于是一战于三元里而夷目大困，一截燒于虎門橫挡而夷艘燬烬”。这段话表明群众力量發揮的客观实际已经对他有所影响。这种抵抗外国侵略力謀国家独立富强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这是魏源思想先进的一方面，他尚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有从封建統治政权利益出发的因素。他要求国家能够强，能够改变，政权机构能够重新整頓振作，但其总目的却是要使这个封建国家能恢复过去的声威，能永踞于天朝上国的地位，也即达到他“原叙”中所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的“盛世”；他主張組織民力的企图也不很純粹，他想借此使“沿海銷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梟匪……以毒攻毒，毒去而药力亦銷”（卷一，“議守下”）。这是企图通过抵抗外国侵略来消灭人民大众的反抗力量，这种思想具体表现于他后来在安徽高邮組織团練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动上。不过，从魏源的整个思想状况来看，进步思想还应占主导地位的。

（二）魏源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經濟主張。魏源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如包世臣、龔自珍等一样，都是比較能够細心观察社会經濟問題的。而当时社会經濟中的一个重大論题即鴉片問題，而鴉片又与海外交往相关联，因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发表的經濟主張很多与鴉片有关。魏源在卷二“筹海篇”四“議款”中和卷七八“筹海总論”二所輯之

“粵东市舶論”中都論及鴉片和中外貿易問題，魏源总的意見是反对鴉片輸入而贊成正常通商。他在“議款”中分析鴉片輸入日增的根源是貪污，鴉片輸入的恶果是造成中国財政危机，他在列举了許多中国与英美間輸出入貨品的数字后，作出結論說：

“洋錢流入內地，皆鴉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補之价，至鴉片盛行以后，則絕无貨价可補，而但補烟价。洋錢与紋銀皆日貴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卷二）这个分析表明魏源对鴉片之害的看法也沒有超脫当时的一种最流行的观点，即归結到白銀問題上。因此，重視白銀成为他的一种重要的經濟主張，所以他說：“使无鴉片之毒，則外洋之銀，有入无出；中国銀且日賤，利可胜述哉？”（卷二）仅靠外洋购貨入銀尚感不足，所以又主張：“若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許民屯垦。沿海之銀矿山，許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卷一）粮食和白銀的增加是魏源富国的两个主要办法。除此以外，魏源还主張发展民用工业，他提出中国自己設厂造炮艦，同时又主張可兼造些商船，以及“量天尺、千里鏡、龙尾車、风鋸、水鋸、火輪机、火輪舟、自来火、自轉碓、千斤秤之屬，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卷二）由于当时守旧派反对用机器而目之为“奇技淫巧”，魏源反駁这种謬論，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同时还对这种发展寄予很大的期望說：“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見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指出中国完全有可能追上西方。这种看法应该说超出于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了。

（三）魏源在书中介紹了許多西方的新知識。这些新知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地理知識。在“海国图志”中有地图二卷，这些地图由于魏源接受新知識而具有很多特色。很重要的一点是魏源接受并正式介紹了地圓的概念（是地理概念而不是哲学家的思考概念），在“后叙”中說：“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渾圓也”。因此书中各图都是从地圓的概念出发而用投影法摩制的，虽然当时在縮图技巧上还很差，形状、位置和距离还不够准确，但大体方位已具。书中所載的地图是較完备的，除了历史沿革图外，有地球正背面图和亚、非、欧、美各洲地图，这些图上的国名地名已接近現在的定名（如地中海、瑞士、英吉利、佛兰西等名），而沿革图上又附注中国历史上称呼外国的旧名，尤便查考。其次，魏源又以自己的認識来介紹外国历史、风情和文明。例如，他說英国是（下轉第46頁右栏）

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 看无产阶级早期斗争的发展

—— 健 平 ——

“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

①。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个阶级创造了无限的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阶级却是无产阶级。无产者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生产了剩余价值，而它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占有了。因此，这样一个阶级必然站在跟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位置。

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下面，无论是个别的无产者还是整个无产阶级，“都不可能象人一样

地生活、感觉和思想”②。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挣到的工资却难以维持温饱；经常担心自己的饭碗，还往往被抛到失业者的行列里。如果要摆脱那种非人的状况，他们就得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作斗争。

事实正是这样。“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的。”③这种斗争开头是自发的，尔后就发展到自觉的阶段了。

马克思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是现代工业的初生儿，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从英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的史实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二

早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英国的工人便开始组织各种团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他们往往直接行动起来跟雇主对抗，有时候也向政府请愿。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以后，工人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英国是个纺织业盛行的国家。羊毛纺织是英国最大和最普遍的工业，从十七世纪中期起棉纺织业又在兰开夏发展起来。工业革命一开始，英国的纺织业手工业者首先面临厄运了。1790年以前，英国使用机器的部门几乎全限于棉纺织生产，就地区看也只限于兰开夏。因此它只影响到英国人口的一小部分。此后，当机器开始应用到毛纺织业上的时候，英国这个以毛纺织业著称的国家几乎没有一地不受影响了。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涌入产业后备军。同时圈地运动越来越紧，破产的农民也源源挤入产业后备军的行列。一些人挤进了工厂的大门，还有好些人被排斥在厂门以外，流浪于工业地区间。这是一种情况。

工业革命以前，一般地说，纺织手工业者还生活得过去，甚至有些悠然的田园之乐。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恩格斯曾这样地描述过：

“在使用机器以前，把原料纺成纱，然后织成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着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

“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心平气和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闲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经是一种休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4页。

息。”^①

随着机器工厂的产生，这种境遇消失了。那些产业后备军里有幸运进入工厂大门的人，当初的待遇还稍好一点，往后却江河日下了。例如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間，紡織部門工人的工資就是逐漸下降的。到1800年，他們早先在若干紡織工業部門享有的較高的工資已成过去了。工資向下，物价往上，这又是一种情况。

很显然，許許多多的人破产了，許許多多的人幸运地找到了工作而生活却一天难一天。为什么会这样？他們从表面上看以为是使用机器的結果。因此工人們屢次发动起来，捣毁机器。这种捣毁机器的行动，开头盛行于棉紡織业中心兰开夏，后来扩展到好多工业地区。发明“珍妮机”的哈格里夫斯曾不得不因此从兰开夏迁到諾丁汉去，阿克萊特等人創設的工厂也吃过这种苦头。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几次起来，許多机器被毀于憤怒之中。这种行动，是英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初手段。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②

工人捣毁机器的行动延續到十九世纪早期，这就是所谓的“卢德运动”^③。工人們把自身的苦难遭遇发泄到机器上去，那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反抗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愤怒情绪，又反映了工人阶级当时的認識：还未看清使他們痛苦的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剝削他們的不是工厂而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自发地起来了，認識的深化还有待于斗争的持續。对此，馬克思曾經說：“工人要能分別机器与机器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从而，不以物質生产資料自身而以物質生产資料之社会的剝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是还要有相当的时日和經驗的。”^④

三

英国工人阶级除了捣毁机器以外，还使用了其他的斗争武器：組織工会和举行罢工。

以前，英国工人就有些組織，但是在工业革命和大工厂发生以前，那不过是些地方性的手藝人的組織。十八世纪晚期，也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作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經濟斗争組織的工会才真正出現。1792年起，組織工会的事在兰开夏紡織工业工人中間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对此感到恐慌了。英国政府連忙采取压制的行动，在1799—

1800年頒布了恶名昭著的“結社条例”。那条例規定，任何結社都是非法的。

“結社条例”的出現，一方面說明英国的議会和政府維護誰的利益，压制誰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英国工会組織蓬勃发展的情况，体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已經具有怎样的力量。“結社条例”的实施，严重地阻碍了英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但是却不能扼杀它。那就是說，結社条例虽然严，却不能阻止已有的一些工会轉入地下，也不能阻止工人秘密結社。举例說，1812年，英国第二个棉业中心格拉斯哥織工的总罢工就是由秘密团体組織的。格拉斯哥紡紗工人的工会是在1816年秘密成立的。1818年，在曼彻斯特，工人还酝酿成立工会联合組織。

“結社条例”存在期間，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光輝的斗争。那时候，英国先是年年歉收而又处在对法战争中。滑铁卢之战以后，战争过去了，但是由于战时訂貨突然停止，由于久經战乱的欧洲大陆一时无力购买大量的英国貨，成千上万的工人特别是鉄业和煤矿工人失业了。三十万复員軍人又涌入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又加剧了失业的严重性。工資在下降，物价却因为通貨膨脹而被人为地提高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决定了当时斗争的猛烈性。捣毁机器的事件有增无已，暴动层出不穷，罢工成为經常的普遍的現象。举例說，1810年，东北海岸的矿工举行了罢工。1811—1812年，发生了大規模的捣毁机器的运动。1812年，格拉斯哥的棉織工人为工資問題相率罢工，接着从卡萊尔到亚伯丁所有織机都停頓起来。这是棉織工人的空前規模的罢工，而且持續了三个星期。1815年，英国議會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35—36頁。在这里恩格斯指出手工业者的生活比后来工人的生活好，同时也指出“他們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此时以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貴族服务的工作机”。

② 同上书，第264頁。

③ 据说英国有一个工人名叫納德·卢德，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期，首先捣毁了織布机，后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就照他的榜样行动。这种捣毁机器的行动历史上称为“卢德运动”。大規模的卢德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早期，特别是1811—1812年和1815—1816年。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21頁。

議通过了“谷物法”^①，一系列的暴动跟着发动起来。还在議會討論谷物法案的时候，伦敦发生了暴动。接着，柏利·圣·埃德蒙兹有失业工人捣毁机器；泰因河上的紐卡斯尔有煤矿工人起来反抗；普列斯顿的失业紡織工人；諾丁汉的工人捣毁了几十架机器，伯明翰也有失业工人暴动。各地暴动起伏直到1816年年底。那一年，威尔士南部的矿工联合鋼鐵工人罢工，打垮了资本家削減工資的企图。1818年，苏格兰矿工和兰开夏織工也发动了罢工。在那些斗争中間，人們已可看到工人阶级那种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阶级情感：进行斗争的工人經常以罢工和捐款的方式来彼此援助。

英国政府对工人阶级和不满的人民施加高压或武装镇压，于是发生了“彼得卢屠杀”，又頒布了可耻的“六項法令”^②。但是高压阻止不了斗争。斗争还是前仆后继地进行着。1824年，英国工人阶级终于冲破了“結社条例”的铁栏，“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貴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結社的权利。”^③

四

“偏袒而专横”的“結社条例”的取消，虽然没有給予工会运动以无限的自由，但是已足以打开水閘而使巨流倾泻奔騰了。英国工人卷入了“組織工会的热潮”，工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地成长出来。

“所有的劳动部門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它們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④

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根据經驗，看到部分的罢工尽管十分坚强还是失敗居多，从而逐漸认识到只有結成統一的組織，才有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說，不仅要組織个别行业的职工会，而且要把許多行业工人的工会結合成所有行业工人的工会；不仅要有地方組織，而且要有全国性的組織。1824年以后的許多年，英国工人組織工会，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向着革命的工会主义方向发展的。

英国第一个出色的工会領袖是出現在兰开夏的約翰·杜赫蒂。他早在工会非法时期就受到了鍛炼，终于成为棉业工人信任的領袖。1829年，在杜赫蒂的积极参与之下，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紡織工会的代表在曼島举行會議，成立了英国全国性的棉紡工人的工会，即“联合王国大总工会”。兰开夏的棉业工人早在1792年就开始組織起来了，但是始終是地方团体。它們在“結社条例”期間常

常跟格拉斯哥和苏格兰其他地区的棉业工人組織結合起来，但那不过是紧急时期成立的暂时同盟。因此，这个工会是棉紡工人第一个全国性組織。第二年，杜赫蒂所领导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在曼彻斯特成立。它的目的既在于团結整个的工人阶级，又在于反对削減工資。这个組織很快就有一百五十个工会参加进去，其中大都是兰开夏、米得兰的紡織工会，同时也有机器、矿业、陶器和其他行业的工会，加入的会员据說曾多到十万人。它的出現显示了工会运动的巨大进展，但是更大的进展还有待于日后。

“全国劳动保护协会”存在了两年。在它消失以后，英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进展是1832年“建筑工人工会”的成立。这个工会主要是由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接木匠、石匠、砌磚匠、塋匠、鋸木匠、油漆匠和建筑业普通工匠等七种建筑工人团体联合而成的。它联合了建筑业的各种工人，不久即拥有会员四万人左右。1834年初，它合并于新成立的“全国各业总工会”。

在“全国各业总工会”身上充分反映了大的統一的工会的思想。这个組織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积极参与組織的，于1834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特別大会上成立。它的会章的第四十六条，說明它的目的首先在于提高工人的工資，制止工資的下降，縮短工作的時間；又說明它的最終的伟大的目的乃是确定劳动的和人道的神圣权利。很显然，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自发的和革命的阶级意识。

工人蓬勃发展的年代仍然是英国工人斗争激烈的时期。上述的工会組織在斗争中是起作用的。例如“全国劳工保护协会”曾以募捐方式筹集巨款，援助了埃斯頓安得来因棉紡工人反对新工資而于1830—1831年冬举行的罢工。“建筑工人工会”在

① 1815年，英国議會通过的谷物法规定：当小麦每夸脱的价格低于八十先令的时候禁止任何小麦进口。这个维护地主的法案給人民生活增加了困难，工业资产阶级认为与己不利也反对它。

② 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有八万群众在市內圣彼得广场集会，要求改革議會和取消谷物法。政府的武装突然闖入会场，袭击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打伤四百多人。这就是“彼得卢屠杀”。在这以后，英国議會又通过了“六項法令”，禁止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压制书刊的出版发行，賦予地方官吏搜查私人住宅的权力等等。

③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64—265頁。

④ 同上书，第265頁。

1832—1833年組織和支持了利物浦和曼徹斯特建筑工人对承建商的斗争。“全国各业总工会”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参与了为工资、工时和加入工会权利问题而引起的全国性的罢工。例如在德貝，有一千五百名男女工和童工因拒絕退出工会而被雇主解雇。德貝工人罢工期間，“全国各业总工会”号召会员捐款，援助了他们。不久，多塞特的托尔普德村的几个农业工人因組織“农业劳动者联谊会”而被迫害，并被判处了七年徒刑。这件事立即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有二十五万多人签名要求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受害者。在伦敦，工人举行了首次大游行，至少有十万人参加游行的行列，那里的建筑工人还是罢工来参加的。“全国各业总工会”成功地领导了这次抗议运动。不幸的是它缺乏坚强的领导，不到一年就消散了。

不管怎样，“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①。因此统治阶级既恨它又怕它。不是吗？英国内务大臣皮尔爵士在辞职的时候，曾以粉碎“全国劳工保护协会”作为留给他的继任人的主要任务。“联合王国大总工会”成立以后，曼彻斯特警察当局惶惶不安。他们向内务大臣皮尔报告说：“工人结社，久已认为一种大害，而且极难对付者，已于本地呈一种如此可畏，如此有系统之形态，吾人以为应将其最为惊人之特征向君呈报。”^②但是对于工人说，工会是对抗资产阶级的集体力量。工会有战斗力，可是“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③

五

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彼伏此起，前仆后继。无数次争取生活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请愿被拒绝了，无数次的罢工和暴动被镇压下去了。有时候得到一点小让步，而付出的斗争代价也是很大的。这样，工人又逐渐认识到：国家机器掌握在他们压迫者的手里，是为有产者维护利益的工具。在这种认识下，英国工人阶级先投入了要求改革议会的斗争，接着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

滑铁卢之战以后的几年間，改革议会的要求几乎都是工人阶级提出的。“这种要求并不是争取抽象的民主，而是工人群众企图由此控制议会，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④在1830—1832年争取议会改革的高潮里，工人显示了雄伟的力量。议会讨论

改革法案而被上院抗拒的时候，请愿书从全英各地雪片似地飞来，伦敦变成了巨大猛烈的示威场所。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终于促成了议会的改革。但是根据这次改革法案的规定，选民仍受财产资格的限制，选民人数只不过从二十二万人增加到六十七万人（当时英国人口是一千四百万人）。英国工人阶级仍旧是无权的，不久他们投入了新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

我们知道，宪章运动是在伦敦的激进的工匠中间酝酿起来的，而它的中心地区却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地。“人民宪章”所包括的“六点”^⑤“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民主的原则改组下议院。”^⑥这些要求获得了千千万万工人的热烈拥护，在各地的群众大会上得到一致的赞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宪章运动的社会性质逐渐鲜明了。那正如一位参加者在曼彻斯特二十万人的大会上所说的：“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房好，吃喝好，工资高，工作日短。”^⑦宪章派在伯明翰通过了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请愿书，同时提出了关于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请愿书。当宪章运动成为纯粹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在它第二个高潮期间，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济贫法^⑧都成为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一部了。这一切反映了“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⑨，反映出宪章派的口号——“政治权力是我们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0页。

② 卫布：“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版，第112页。

③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69页。

④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97—298页。

⑤ 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9页。

⑥ 同上书，第278页。

⑦ 同上书，第281页。

⑧ 英国从前也有济贫法。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新济贫法比以前的更苛刻。它规定每个需要救济的人必须住在济贫所内，而在济贫所内家庭是被拆散的，食物不足而又恶劣，所给的工作又是低下的。资产阶级这样作，为的是迫使有劳动力的人到工厂去乞求工作，即使工资最低也得去干。

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8页。

目的”的实质意义。

宪章运动经历了三个高潮，可以看到它的高潮正是英国工人罢工和起义的高潮。1838—1839年，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期间，英国各地似乎都在准备武装起义。1839年7月4日，在伯明翰，警察袭击宪章派正在集会的场所，工人奋起抗击，几天以后，伯明翰的秩序才恢复。伯明翰警察暴行事件的消息传出以后，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松德兰和若干兰开夏的市镇都发生了流血冲突。稍晚一些时候，南威尔士的几千矿工，一部分备有武装，跟袭击他们的军队发生了战斗。1842年，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期间，反对削减工资的斗争在兰开夏各地爆发起来。从7月到8月，斗争的火焰从斯泰布里雷芝扩张到埃斯顿、海得、曼彻斯特、克利波尔特、波尔顿以及所有的工业区。宪章运动第三次高潮的1848年，斗争形势比前两次微弱了，但是格拉斯哥等地仍有严重的斗争。

宪章运动一开头，英国工人阶级就作为一个独立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已经把资产阶级看作主要敌人了。更重要的是，从前“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①这说明了宪章运动期间，英国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进入自觉的阶段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几乎经历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他们的斗争曾经迫使统治阶级作了一些让步。例如1802年颁布了学徒法（英国第一个工厂法），用以防止雇用贫苦

儿童的一些流弊。1833年通过的工厂法，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天工作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在这以前，在1819、1825、1881年先后通过的几个有关工作时长短的工厂法或未被遵守，或只部分地被遵守）^②。1847年通过的十小时法案限制了妇女和青年的工作时间，实际上也为大多数成年男工保证了每天工作十小时。那些年代的斗争锻炼了英国工人阶级，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已经继续了八十年的工人反抗工厂主的战争，从捣毁机器开始的斗争，通过联合，通过对于工厂主和少数投靠工厂主的工人的个人财产的攻击，通过规模较大的起义，通过1839年和1842年的暴动，发展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③

但是，经历了组织革命的工会和宪章运动的英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却不象以前那样以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来向资产阶级斗争了。“防御而不挑战”成为许多熟练工人工会的“箴言”。这种变化跟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具体地说，四十年代末，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取得了“世界工厂”的独占地位。资本家的利润不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几百或几千了。他们以其利润的九牛一毛来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作些经济上的让步，在英国工人阶级里制造了“工人贵族”。这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8—279页。

② 参看上书第216—223页。

③ 转引自“新编近代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2页。



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 人民群眾的作用

豁 然

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破壞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途。在這之後的一個世紀，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最終地在英國確立起來了。但是，它的意義還遠遠超出英國的範圍。馬克思曾明確地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並不是英國的革命和法國的革命；這是歐洲範圍的革命。……它們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在這兩次革命中獲得了勝利；然而，當時資產階級的勝利乃是表示新社會制度的勝利，……這兩次革命表現當時整個世界需求的程度，要比它們表現本身發生地區即英法兩國需求的程度更要大得多了。”^①因此，可以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首次真正地為英國，也為全世界开辟了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道路。

在這次革命中，各個階級，由於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同而起着不同的作用。英國的資產階級及同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的新貴族，是當時革命的動力之一，並且是革命的領導者，因而對實現英國革命無疑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是，這次革命的基本動力却是當時的英國人民群眾，即農民和城市平民。資產階級的历史著作或教科書，經常抹煞人民群眾在這次革命中的作用，歪曲這次革命鬥爭的階級實質。和這種抹煞、歪曲進行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家的經常性任務。蘇聯史學家在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本文打算扼要地論述一下當時英國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然而論述人民群眾的作用，絕不意味着僅僅孤立地論述人民群眾的活動，必須根據整個革命過程中各個階級的矛盾鬥爭，分析和了解人民群眾的作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認識人民群眾的作用。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將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分為革命的準備和開始階段、內戰階段

和共和國階段，以便分別論述人民群眾在這次革命過程中的作用。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1640年開始的。這個革命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十七世紀英國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歸結，是經過相當長期的革命醞釀，才造成了革命形勢。革命形勢的特徵，根據列寧的指示，有下列三點：“（一）統治階級不可能照老樣子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某種危機，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機，造成了裂縫，被壓迫階級的不滿和憤恨在裂縫中爆發出來。單是‘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通常還不足以使革命發生，還需要‘上層不能夠’照舊生活，革命才能發生。（二）被壓迫階級貧困達於極點。（三）由於上述各種原因，大大地提高了群眾的積極性……”列寧接着指出：“沒有這些不但不以個別集團黨派的意志為轉移，而且不以個別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變化，照一般的規例說，革命是不可能的。這些變化的總和就叫做革命形勢。”同時列寧指出，從革命形勢中引起革命，是在這種時候，“當革命的階級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其勢之強足可推翻舊政府，這個舊政府假如不把它推翻，甚至在危機迭起的時期，它是永遠不會垮掉的”^②。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正是具備了列寧所說的這兩個根本標誌：首先是人民群眾的發動，造成了使資產階級能夠着手爭取政權的前提；其次，‘上層’的政治分裂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削弱了統治階級的力量。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城市平民和農民運動，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已逐步高漲起來了。這一時期的人民群眾運動，雖然只是零星的起義，但卻此起彼伏，始終不斷。1607年在英國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4頁。

②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1卷，“第二國際的破產”。

的中部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达数万之多。他们捣毁了土地上的栅栏，占据了城市，坚决地反对圈地者。城市平民也起来支持农民的斗争。起义者自称为“平等派”和“掘土派”，这正是后来英国革命中最激进党派所沿用的名称的起源。英国的统治阶级虽然镇压了这次自发的群众运动，但是，这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大义愤，造成规模更大的起义。三十年代，英国东部就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所谓“沼泽居民”运动。继而西南部也发生了农民起义。政府派军队去镇压，但始终未能彻底镇压下去，这个运动一直继续到全国规模革命的爆发。在革命爆发的前夜，农民运动已有燎原之势了。这些农民起义说明了农民不满于现存的制度，不愿意再忍受封建压迫了，坚决要求实行根本改革。这些农民起义动摇了现存的秩序，造成了封建制度的深刻危机。

英国封建王权的危机，由于苏格兰起义而更加严重起来。英国广大阶层的人民，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同情苏格兰人而反对国王，几乎找不到愿意去和苏格兰人作战的人。为了获得金钱以便和苏格兰人作战，查理一世于1640年4月13日被迫召集了议会。但是议会并未拨给和苏格兰继续战争的金钱。查理目的未达又解散了议会，此即所谓“短期议会”。议会的解散掀起了人民群众运动的高潮。1640年5月6日人民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手工业帮工和学徒，“骚斯渥克的庶民”（包括水手、搬运夫、日佣工人和最贫苦的手工工人）特别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5月14日伦敦又发生了骚动。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英国的整个农村，人民群众也开始了革命发动。许多地方的农民都认为这时候是争取土地和经济解放的最好时机。1640年的春季，一部份农民开始对排乾公社沼泽地的人们和其他的迫害者提起了诉讼，另外一些人则直接采取了强硬的行动。当时，一个地主在列举农民的各种强力的行动时说：“农民尽其所能地加害于我们”，“各乡村联合到一起，结成联盟以便在进行这样的行动时相互保护，因而如果不采取紧急的措施，他们就会更进一步；我们这些房屋主人都面临一种危险，这就是我们的房屋将要被烧掉或是被毁坏。”其余部份群众也都在酝酿着采取行动，对这种形势，当时有一个人曾这样写过：“在人民中间正发生着你所不能想象的集会和阴谋。”^①可见1640年春夏之际，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已大大地高涨起来了。正是

人民群众的大发动，动摇了现存的封建秩序，赋予资产阶级以革命力量，推动着英国革命在十几年中始终沿着上升线发展。

这是构成革命形势最主要方面的因素，可是我们知道构成英国革命形势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这就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造成了裂缝，被压迫阶级的愤激从中爆发了出来，促使革命全面爆发。所以，我们还要谈一下英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危机。

如前所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所发生的苏格兰起义，是促使英国革命发生的一个推动力量，它一方面激发了群众反对国王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苏格兰战争也大大地削弱了国王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英国新贵族从封建阵营中分化出来这件事，给英国封建统治以极大影响。这个分化，主要表现在王权与议会的斗争上面。英国从十三世纪开始，就有等级代表机关——议会和王权并存。在十六世纪末期以前，王权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一般说来还未发生冲突，因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很软弱，需要强有力的政权的保护。但是，随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了，同时新贵族也从封建贵族中分化出来。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王权与议会的斗争。王权与议会的斗争和人民群众反对王权的斗争以及苏格兰人反对国王的斗争是互相交织的。在革命危机由于苏格兰起义而加深的情况下查理所召集的短期议会的解散，更加激怒了人民群众，他们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和骚动。这表示着下层人民群众的斗争和上层国会反王权的斗争已经合流了，是革命前夕革命形势到来的标志。

前面，我们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指示，分析了英国革命准备时期各个阶级的发动情况。我们看到英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下层人民群众运动和上层的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危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人民群众运动的高涨是革命形势到来的主要因素；因为第一人民群众运动的高涨赋予了资产阶级以力量，造成资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条件；第二，如果没有强大的群众力量足以摧毁旧政府，这个旧政府既或是在革命危机时期也不会自行倒台的。

在革命形势的高涨情况下，查理一世于1640年11月3日又被迫召开了新国会，史称“长期国会”。

① 引自“新编近代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页。

長期國會的召開，已經标志着全國規模的革命開始了。長期國會的活動是從審判斯特拉福叛國案開始的。最初，當斯特拉福被逮捕後，議會中的貴族代表和國王查理一世本人曾企圖營救他；但是倫敦的人民群众——工人和手工業者於1641年5月初旬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先後包圍了議會大廈和國王的懷特浩宮，堅決要求處死斯特拉福；貴族們被迫判處斯特拉福以叛國罪，查理也不得不於5月10日在斯特拉福的死刑宣判書上簽字。在處死斯特拉福的同時，議會又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讓步。國會現在非經其本身的同意，已經不能被解散了。英國專制政體的最重要專政機關——星法庭和高等法庭也被取消了，國王的軍隊被解散了。從此，國會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政權。1641年11月議會通過了所謂大抗議書，主要內容是：“要求工商業自由，組織資產階級長老派教會，建立對國會負責的政府。這是英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所擬制的、具有綱領性意義的重要文件，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但一點也沒有關於改善勞動人民處境的規定。雖然如此，在當時還不失為一個有進步意義的文件。1642年1月查理決定逮捕國會反對派皮姆和漢普頓等人。可是，查理一世的計劃並未成功。國會反對派的領袖躲到倫敦商業區里，武裝的市民和大群郊區農民一起佔據了市場和街道，阻攔了國王的路。人民群众把國會反對派從危機中拯救了出來。國王的陰謀失敗後，逃出倫敦，準備糾集反革命力量卷土重來。國會也開始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於是英國便處於內戰的前夜了。在這段時間里，我們看到，英國革命是向前發展了，第一，它在鬥爭中鞏固了自己，實際上取得了整個政權；第二，初步形成了與封建主義對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為英國革命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條件。但是，議會之所以能夠作為一支政治力量而存在，成為對王權鬥爭的組織中心，是因為它有強大的群眾力量為後盾。同時，倫敦的人民群众在言論上和行動上推動和迫使國會前進。

1642年8月22日國王查理一世在諾丁昂城起兵，內戰開始了，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時英國已明顯地分裂為兩個完全敵對的陣營——一個是以國王為首的封建貴族陣營，它的擁護者主要是英國國教會、封建貴族和一小部份大資產階級；一個是以國會為中心的資產階級革命陣營，它的擁護者主要是資產階級、新貴族、小資產階級、自耕農和手

工業者。在戰爭的開始階段，國會軍曾一時遭到失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在國會軍中起主要作用的長老派，不斷地和國王謀求妥協，不願依靠群眾的力量與王權進行堅決的鬥爭。戰爭失敗的危險嚴重地威脅着整個革命。這種形勢迫使作為中等資產階級和中等新貴族代表的獨立派開始採取堅決的行動。英國革命的卓越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家克倫威爾便是這一派的出色的領袖。克倫威爾與長老派不同，他重視依靠群眾的力量。還在內戰開始時，他就建立了一支由自耕農和手工業者組成的騎兵隊。這支軍隊在爭取所謂“正義的上帝的事業”的鬥爭中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作戰勇敢，紀律嚴明，被譽為“鐵軍”。馬斯吞荒地一役（1644年）之勝利，提供了戰勝王軍的榜樣，指明了戰勝國王的道路，大大地鼓舞了整個革命陣營。為了能夠戰勝國王，克倫威爾要求統帥部吸收這次戰鬥經驗，改組軍隊。但是毫無結果，這樣一方面加深了長老派和獨立派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公憤。人民群众的發動在議會統制地區紛紛以許多教派集團與公社的形式出現，而在王黨盤據的各郡則以所謂“棒民”運動形式出現；兩種形式的人民群众運動都對議會不滿。克倫威爾曾直接了當地指出群眾的激憤情緒，他說：“如果軍隊不改組，如果戰爭不更加有力地進行的話，人民就會不能再忍受戰爭而要迫使你們訂立可耻的和約了。”^①群眾運動的壓力，迫使長期國會不得不同意克倫威爾所建議的軍隊改革，不得不同意改變內戰的全部性質。1645年1月28日下院通過了克倫威爾所提出的改革軍隊的計劃。改組了的新模範軍的主要社會成份是自耕農民，馬克思說“他們曾是支持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②，也有一部份手工業者、幫工和學徒。這就是此後在革命中負起革命事業的軍隊，是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改組的意義是深刻的，它是在人民群众強迫之下實現的，而又為廣大群眾參加議會軍打開了大門，從而使內戰從議會片面性戰爭轉變為具有全民性的戰爭了，奠定了革命戰爭勝利的基础。這裡充分地表現了人民群众創造歷史的作用。改組後的克倫威爾的“鐵軍”戰鬥精神昂揚，於1645年夏天在納斯比村附近的戰役中對王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從根本上扭轉了戰爭進程。查理一世逃往蘇

① 引自“新編近代史”第一卷，第50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13頁。

格蘭，被蘇格蘭貴族交給了國會，結束了第一次內戰，國會的統治最後形成了。

但是，議會中的長老派不願廣大的人民群眾在內戰中的英勇犧牲、戰勝國王的丰功偉績，却要獨吞革命成果，以滿足大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上層的私慾。1646年2月取消了所謂“騎士領地制”和他們對國王應盡的各種義務。這雖使土地制度從封建的所有制轉變為充分的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人民的封建義務依然如故。占自耕農大多數的公簿持有農對於地主的依賴關係並未取消，還是要向莊園的貴族繳納貢賦和履行各種封建義務，甚至什一稅也沒廢除。圈地也還在繼續進行。不僅如此，而且長老派還認為軍隊已經完成了任務，無須再存在了，決定要解散軍隊。獨立派領袖克倫威爾的態度是不堅定的。他企圖說服士兵服從復員的決定，但是軍隊中的士兵群眾反對這種做法。他們在革命中什麼也未得到，要求革命進一步發展，反對任何遣散命令。平均派的思想就是在此種情況下在士兵中開始傳播了。平均派綱領的基本要求是：實行普選權，一切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工商業活動完全自由，改革稅收，停止圈地。平均派領袖約翰·里爾本：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領袖之一。他主張實行所謂“人民公約”，即建立在天賦人權學說的原則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憲法。1647年平均派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派別，積極參與政治鬥爭，鼓舞了士兵的革命鬥志。士兵的革命情緒不斷高漲，要求進占倫敦。議會長老派面對着士兵群眾的抵抗，開始干起了出賣革命的勾當，和查理一世舉行談判，陰謀扼殺革命。形勢緊急了，克倫威爾被迫同意了士兵的要求，1647年8月軍隊開進了倫敦，長老派首領逃走，軍隊實際上奪取了政權，在國會中形成了獨立派的多數。但這時軍隊內部又發生了更嚴重的政治分歧。1647年10月底在倫敦郊區的普特尼舉行了由士兵和軍官的代表所組成的軍隊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提出了兩個綱領，獨立派的綱領“建議大綱”和平均派的綱領“人民公約”。普選權是雙方意見的主要分歧點。獨立派的革命性開始消失了，企圖中止革命，但形勢逼迫着他們再前進。1647年11月查理一世逃脫了，各地王黨發動了叛亂，1648年4月內戰再度開始了。所有這些事件，使整個革命受到了威脅，英國面臨着王黨復活的危險。獨立派在人民群眾和士兵的逼迫下讓步了，和平均派團結起來重新對國王進行鬥爭了。第二次內戰時間很短。1648年8月在普列斯頓一役克倫威爾軍隊閃電般粉碎了王軍，國王再度被捕，王黨叛亂被鎮壓下

去了。軍隊又開進了倫敦，克倫威爾按着士兵的要求清洗了庇護國王的議會中長老派。1648年12月5日普萊德上校率領隊伍包圍了國會大廈，把一百四十名長老派議員趕出了國會。這是粉碎長期國會而把它解散的第一步。“普萊德清洗”是一次把政權交給獨立派的真正政策；其意義極為重要，後來的各項措施就從此奠基的。士兵群眾在這次事件中作用很大，馬克思曾說：“英國人民以克倫威爾為代表，解散了長期議會。”^①獨立派真正地取得政權後，在人民特別是在以平均派為代表的士兵群眾的壓力之下，實行了平等派很早就爭取的一些措施。查理一世被控為叛國罪，1649年1月30日，在成千上萬的人民和士兵的觀看之下被處以極刑。接着下院通過了廢除王位和取消貴族院的決議。1649年5月19日英國正式宣布為“共和國和自由的國家”。共和在英國的建立是具有全歐意義的事件。處死國王和建立共和國這兩件事賦予英國革命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平均派及其代表的廣大的人民群眾——自耕農、工人和手工業者，在實現共和的事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是由於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與城市平民分子底參與，鬥爭才能達到徹底的結果，並將查理第一推上斷頭台。”^②

共和國的宣布，表示資產階級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基本上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務。然而獨立派的共和國辜負了人民的期望。獨立派對選舉資格的限制和從前沒有什麼差別，實際上能夠被選入國會的只有貴族和富商。獨立派所採取的沒收和拍賣國王、教會和某幾類犯罪貴族土地的土地政策，對人民的封建義務同樣沒有取消；農民不但未得到絲毫土地，而且剝奪農民土地의圈地運動的規模却愈來愈大了。這就是說，獨立派的政策是片面性的廢除封建義務，根本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政治和經濟要求，而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這一點表現了英國革命的保守性，馬克思認為這個保守性的謎應該以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同盟來解釋。在獨立派的反人民的政治經濟政策下面，人民群眾的貧困化是不可避免的。長期內戰的破壞，農業和手工業的停滯、糧食價格的提高，使人民紛紛破產失業。人民在死亡的威脅下，革命情緒又增長起來了，平均派和獨立派的鬥爭重新尖銳化了。1649年春，里爾本發表了一本叫做揭發英國的新鎖鏈的小

① 轉引自“新編近代史”，第72頁。

②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20頁。

冊子。里尔本认为克伦威尔是威胁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他号召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粉碎新鍊铐，推翻新暴政。独立派以逮捕里尔本答复了平均派。应当指出，平均派运动并不是彻底民主主义的，他们要求解散长期国会，然后在普选基础上选出新的国会，可是他们不愿意给工人和城市贫民以选举权；他们提出了一些土地要求，如归还被圈的公社土地，废除什一税等，可是他们并不想在农村中完成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不要求彻底废除各种封建义务，也不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派的纲领明显地暴露了它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这就是说，平均派这时已不能代表整个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要求了。这一点已预定了平均派对独立派斗争的失败后果。

由于平均派的局限性，导致了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派别的产生，这就是1649年出现在政治斗争舞台上的所谓“掘土派”。掘土派的运动意味着城乡贫苦人民深入的反封建斗争，他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而且要求财产上的平等。以温斯坦里为首的掘土派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人们应当赶快把私有财产这个万恶的东西从世界上赶走”，“一起工作，一起吃面包”，“消灭私有制，那时就没有富人、穷人之分，压迫与战争也就消灭了”^①。掘土派的运动是“作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的先驱者之阶级”的独立运动^②当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但是，这种财产公有的要求的真实历史意义在于它的反封建方针，实际上是对当时地产分配性质的否定。掘土派企图以和平方法实现他们的主张，不号召人们通过革命暴力来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存社会制度，而过于迷信说服的方法，以为剥削阶级会自愿放弃剥削，这是一种错误的，反映阶级矛盾尚未充分发展的思想。不过，如果认为温斯坦里原则上就是“不抵抗主义者”，在一切情况下只是主张采用“和平的”活动方式那是不正确的，他承认革命推翻国王是合理的。尽管温斯坦里的思想具有乌托邦的幻想，但它却使十七世纪的革命成了英国资产阶级心上的恶魔和英国劳动者的战斗旗帜。正如列宁所说：“虽然他们有历史的局限性，虽然他们当时关于摆脱一切灾难的方法，概念还常常是天真幼稚的，但他们在许多世纪中间，仍不失为明灯和导师。”^③正当以掘土派为代表的下层人民和独立派统治者斗争激烈的时刻，平均派断然和掘土派划清界限，宣称“我们从没有想要平均人们的财产，我们的最高意图就是每人都有最大保障来利用自己财产的共和国。”我们在这里指明了平均派和掘土派的阶级性质和他们的弱点，是为了

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不能合作而同归失败。

由于平均派的阶级局限性，虽然能和独立派展开坚决的斗争，但却不能联合掘土派，因此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掘土派的纲领又多空想成份也不可能实现。这样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削弱了，终被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各个击破，诚然平均派曾企图发动军队起义，但未获成功。平均派和掘土派的被镇压意味着民主派的失败和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胜利，从此排除了人民群众对国家直接发生影响的可能性，打断了英国革命的上昇线，规定了英国革命的保守性。克伦威尔也从英国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转变为英国革命的拿破崙了。

综上所述我们从英国革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正如列宁所说：“正是城市贫民……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农民的联盟，赋予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以规模和力量。”^④

可是，人民群众既然是英国革命中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平均派和掘土派为什么被镇压下去了呢？为什么不能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群众并不是英国革命中的决定性力量呢？我们说：人民群众确实是一个决定性力量，而且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也确实曾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服从过自己的意志；但是人民群众如果要在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使革命进一步发展，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并且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然而英国当时的情况怎样呢？第一英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做为一个阶级形成起来；第二，英国的农民发生了剧烈变化，贫苦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利益已很不一致了；平均派和掘土派的分裂，正是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第三，城乡人民之间缺乏组织上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英国人民的斗争，在当时的英国只能以失败告终，而以自己的痛苦牺牲继续创造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所以我们说，在反对英国王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无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人民群众是这一次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① 叶菲莫夫：“世界近代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俄文版，第183页。

④ “列宁全集”，第17卷，俄文版，第373页。

教學問題

“辛亥革命”一章的教法建議和教材分析

北京女十二中 刘 占 文

“辛亥革命”是高中中国近代史課程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在准备这一章教学的时候，我們首先要钻研教材，挖掘教材的思想性，明确本章的教学目的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然后以教学目的为綱，确定讲授的重点，选择典型教材，对教材做系統的富有邏輯性的組織安排，考虑运用什么教学方法来完滿地达到教学目的；最后把整个教学计划全面地写出来。本文仅想就分析、組織和如何讲述教材方面提出个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同志們交換意見。

一 教学目的和講授提綱

我认为本章的教学目的应当是通过对这一阶段具体历史事实的讲述和分析，使学生有以下几点認識：

(一) 二十世紀初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清政府封建剝削的加重，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反抗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民族資本主义，也要求打破现状开辟发展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形势形成了。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积极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二) 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綱領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它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組織作用和宣傳作用。不过它还存在着根本性的缺点，因而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三) 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下取得的；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軟弱

性和妥协性，在革命中逐渐失去了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从而証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

(四) 通过这一单元的历史教学，使学生受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等方面的思想教育。

要使学生完整地系統地了解这一阶段历史，更多地受到四个观点的教育，讲授辛亥革命的历史，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綱領；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辛亥革命的經過、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关于本章教材的讲授提綱，試拟如下：

(一)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1) 社会背景

1. 农民抗捐抗稅斗争的展开

2. 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傳播

(二)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綱領

(1) 同盟会的成立及其历史意义

(2) 同盟会綱領的分析和批判

(三)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

(1) 同盟会的活动

1.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

2.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2) 席卷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风潮

(四) 辛亥革命

(1) 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

1. 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
2. 立宪派趁机抢夺革命果实

(2) 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失败

1.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破坏中国革命
2. 清帝退位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3)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二 教法建議和教材分析

对这一章教材的分析、組織和講授方法，拟按上列講授提綱，逐条地做一些說明。

(一) 資產階級革命运动的兴起

I 教法建議

第一部分講資產階級革命运动兴起的社會背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的展开和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講述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經濟的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以和前面講过的历史连接起来，使学生的知識系統化；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可使学生認識到資產階級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仅仅是一些先进知識分子和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的結果，从而貫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第二部分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傳播。講授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說明在上述革命形势发展下，資產階級革命条件日漸成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展开了革命活动和文字宣傳，他們的活動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要使学生認識孙中山的革命毅力和实践精神，認識他是中国共产党誕生以前中国先进人物中的杰出代表，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鐘”两书，文字通俗，爱国热情洋溢，对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做了痛切的具体形象的陈述，选讀几段，感染力很强，可以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痛恨敌人的思想感情。

II 教材分析

(1) 社会背景

1. 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的展开。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又攫取了許多特权，控制了中国的交通、厂矿和金融事业，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大量賠款的負担及主权的丧失，

更引起了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痛恨。同时，由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因清政府勾結帝国主义侵略者殘暴鎮压而失败的，也刺激了人民反抗清朝統治者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人們已不再象过去那样相信清政府能自动改革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相反地，却相信只有推翻清朝統治者才有实现改革的可能。革命的呼声又在中国大地上响起来了。

为了緩和国内日益尖銳的阶级矛盾，为了討好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相信它是忠順的奴才，清政府于1901年到1904年間，陸續发表了一些假維新的命令，宣布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实行練新軍，建立办理各項新政的机构，并表示对民族工业采取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在实施这些“新政”的期間，清政府以籌措款項为名，加緊了对人民的剝削。各省为了繳付攤派的大宗賠款，除加强旧捐稅外，又增加許多新捐稅，名目繁多，不下一百几十种。

在清政府的橫征暴斂下，人民忍无可忍，在各地展开了抗捐抗税的斗争。規模最大的是江西乐平县群众的抗捐运动。乐平县是靛青的主要产区。清政府借口籌措学堂經費，增征“靛捐”，引起人民的无比憤恨。1904年在会党的领导下，乐平人民群起反抗，冲入县城，捣毀盐卡厘卡，燒毀县衙門，打毀学堂，发展成为与清政府官兵列陣对仗的武装斗争。同时期，河北广宗人民发动起义，豎起“扫清灭洋”的大旗，打下几个州县，河北、山东、河南諸省二十多县的农民，紛紛起来响应，震撼了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广西人民的抗捐稅运动，也发展成武装起义，部分起义軍还进入邻近各省展开斗争。

2. 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紀初年，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經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1902年中国設立的厂矿总数是十五个，其中商办的有十个，資本占資本总额的22.5%，1905年厂矿数增到五十四个，其中商办的有四十七个，資本占資本总额的52.7%。又如，1901—1905年共办了十一个煤矿，其中商办的有六个，資本占資本总额的64.6%。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初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交通運輸方面，二十世紀初年出現了較多的商办輪船公司，經營沿海和內河的客貨运输事业。在铁路方面，各省也紛紛申請自办。

但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严重地阻碍

着这种发展。由于帝国主义通过清政府，在中国开设工厂，倾销商品，把持路矿，攫取原料，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国内的封建统治，也严重地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之间便发生了矛盾。

从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等，都要求打破现状，推翻清朝的统治，以开辟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2）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

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打破现状的要求，他们接受了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爱国运动和抗捐抗税斗争的刺激和启发，开始觉悟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必须起来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他们逐渐展开革命活动，在国内和国外组织许多爱国组织和革命团体；还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爱国民主革命的思想。上海和日本东京是他们活动的中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心人物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已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894年他在檀香山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集合同志，募集款项，结纳会党，联系军队，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计划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经历日本、欧美各国，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事业做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戊戌变法后，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为了加强革命活动，派人到香港办报纸，鼓吹革命，加强联系会党；同时积极开展争取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在华侨中大力发展会员。由于孙中山的积极领导，民主革命和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开始高涨起来。

1903年，蔡元培、章炳麟和一部分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参加的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联系江苏、浙江一带的反清会党，进行革命活动。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湖南组织“华兴会”，提出“推翻满清，复兴中华”的口号，联络哥老会，准备发动起义。

同一时期，湖北的爱国青年也开始投身新军，

在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散发革命的宣传品。1905年又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介绍世界形势，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湖北军学界不少人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会员又纷纷投入新军，发展革命势力。日知会是当时比较有力的革命团体之一。

在各个革命团体相继出现的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书刊也纷纷出现。这些书刊中，影响最大的是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具体内容见高中中国历史第三册，从略）。

陈天华、邹容、章炳麟等的革命思想，激发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对革命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猛回头”与“革命军”两本书，遍传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效果尤大。

（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

I 教法建议

在这一标题下，主要讲两点。第一，指出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组织，它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形成；指出它对中国革命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第二，介绍和分析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指出它的纲领，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弱点，比如缺乏实现民族真正独立的纲领和明确的土地革命的纲领等，但它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限制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等主张，确是接触到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迫切盼望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尚未被推翻时的中国，这个纲领是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的，它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对它的弱点也应具体加以指明。通过这样的分析和批判，可以培养学生的历史主义观点和分析批判的能力。

II 教材分析

在1894年到1905年间先后成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都是地方性的组织，是分散的、不相统属的，因而他们的革命活动也不能互相配合。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发展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统一领导，集中力量进行反清斗争，就成为当时所有革命者和革命团体的共同要求。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从中国各地逃亡出来的革命分子和留学生的热烈欢

迎。他們相信孙中山将能领导完成上述建立統一組織的任务。7月，孙中山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日知会的代表六十多人开会。内地十八省除甘肃外，其他十七省均有人参加。會議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推孙中山为总理。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通过会章和政綱，选举了领导机构。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形成。

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組織，包括小资产阶级、反清的地方士紳以及少数工农分子，其中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最多。同盟会的組成，第一，使国内会员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比例有较大增加，加强了革命政党与国内社会的联系和民主革命的气氛，意味着革命势力的扩大；第二，在同盟会成立前的各革命团体，組織形式上都还带有旧会党的色彩，地区的局限性很大。同盟会有較完整的领导机构和政治綱領，可以說已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規模。同盟会的組織发展很快，成立后一年，就有了会员一万多人。

同盟会成立后，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綱領，又出版机关报“民报”，宣傳革命。在民报发刊詞里，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作为同盟会领导革命的方向。

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滿洲貴族的統治；民权主义主要是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創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是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貧富不均的現象。

同盟会的政治綱領是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紧密地結合的，同盟会的四条綱領，就体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便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思想基础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指导思想。

同盟会政綱中的反对清朝統治、进行国民革命、建立民国、注意民生的主張，其目的是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卖国，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实行限制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它不仅要求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国家 and 民主的“国民的国家”，而且要求中国变成一个免于貧富悬殊、人人幸福的国家。这是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因此受到人民拥护而成为鼓舞群众斗争的旗帜。

这个綱領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軟弱及其阶级的局限性，也有它的一些缺点：

(1) 它缺乏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的真正

独立的綱領。从政綱中看不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相反地，在同盟会的对外宣言中却明确规定了承認外国侵略者在华特权，承認不平等条約的繼續。甚至把民族独立的問題只看作滿汉之間的問題，从而模糊了一部分人的認識。因此有些人誤認為推翻清政府便解决了一切問題，甚至毫不設防地幻想帝国主义的贊助，而使帝国主义能利用“中立”或“贊助”的名义来进行破坏。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証明。

(2) 它缺乏明确的足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力量的土地革命的綱領。政綱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民报上也提出土地不当私有的問題，然而并没有提出正确解决土地問題的具体办法。同盟会不是依靠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而是自上而下地以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土地問題。孙中山更申明平均地权“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是定地价（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之增价，則归于国家”），希望能不动员广大农民群众，不触动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而解决土地問題，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它的“土地国有”政策，也是与小农的私有观念相矛盾的，因而它也不可能动员更多的农民来参加革命，而使革命获得胜利。

(3) 它缺乏关于革命前途問題的綱領。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貧富悬殊，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涨。他們以为用“平均地权”的办法，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不经过革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主張“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决不能避免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同盟会的綱領有这些显著的根本性的弱点，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尚未推翻时的中国，它是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的。而且这个綱領在同盟会的旗帜下，經革命党人的長期努力，也获得了部分的实现，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

I 教法建議

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应从同盟会的活动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两方面来叙述。

关于同盟会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展开了革命宣傳，与君主立宪派进行划清革命与改良

界限的論战，另一方面进行了組織武装起义的工作。讲思想論战，要指出这场論战对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陣营所起的作用，也要說明改良派由戊戌变法时期具有进步性到这时变成反动派的道理，以教育学生用历史观点、发展观点看待問題。对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一方面要肯定他們表现的革命热情和振奋革命情緒推动革命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指出其弱点是他們的活動没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結合起来；同时，也应指出湖北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做了一些比較深入的群众工作，对革命起了良好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向学生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

对同盟会成立后几年間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发的反抗風潮，要指出它的普遍性，同时也要以長沙群众的“搶米”風潮和山东萊阳群众的抗捐抗稅斗争等两个規模較大、事迹突出的事件为例做重点讲述，以說明当时中国社会已临革命前夕，清朝的反动統治已达风声鶴唳草木皆兵的境地。这方面史实是不应忽略的，如果略而不讲，就不能正确反映辛亥革命前夕总的政治形势，会給学生以錯誤的印象，使他們感到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来得很突然，好象仅仅是少数革命党人活动的結果。

II 教材分析

(1) 同盟会的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立即成为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領導中心，同时展开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展开革命宣傳，与君主立宪派进行論战，一方面进行組織武装起义的工作；把中国的革命浪潮推向新的高潮。

1.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当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起来的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仍在大力宣傳君主立宪，散布仇視革命的言論，企图引导群众离开革命的道路。清政府为了緩和人民的革命情緒，挽救它的死亡，在1906年宣布了“预备立宪”，立宪派趁机大肆活动，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形成一种与革命派对立的反动的政治势力。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逐渐看出立宪派是推行革命宣傳的障碍，必須揭露立宪派的改良主义反动本质，才能肃清他們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便展开了激烈的理論斗争，同盟会的“民报”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是双方进行論战的主要陣地。論战的題目很多，其中主要的是反清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是否会

引起外国干涉及下层社会“暴动”的問題。

关于反清革命的論战。立宪派要維持清朝的統治，否認清朝有民族压迫；主張“君主立宪”，誣蔑中国人民没有进行民主革命的能力，更没有实行共和的資格，只能首先实行“开明专制”来訓練人民，然后再来立宪。革命派駁斥了这些謬論，認為中国必須进行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革命，要立宪也必須經過革命，不能向清政府搖尾乞怜。指出民权发达是民主革命的結果，因此中国人民有能力和資格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更指出立宪派的要求立宪，只不过是為穩定已經动搖了的清朝反动政权，欺騙和麻痺人民群众。

关于革命会引起“瓜分”与“內乱”的論战。立宪派認為进行武装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必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暴动，造成內乱，必将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亡国的危險。革命派認為革命以建立民主政治为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和爭夺权位的战争，可以有“秩序”地进行革命战争，不会引起內乱。同时認為革命不以排外为目的，决不会招致外国的干涉。

1905年到1909年的四年論战，揭露了立宪派的反动本质，宣傳了民主革命的理論和观点；揭穿了立宪派对革命的歪曲宣傳和欺騙，进一步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陣营。由于同盟会的一些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因而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的威望則大为减低。有不少人离开立宪派走向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下，扩大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队伍，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但是，在論战中革命派也表现出一些弱点，他們对立宪派提出的革命会招来列强的干涉和“下等人”的“暴动”等問題，沒有能給以明确的答复；不能指出只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这表现了他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忽視广大人民的力量。

2.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前仆后继地发动了多次的反清武装起义。1906年发生了浏阳、醴陵、萍乡地区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大規模起义，同盟会會員紛紛从日本归国策划响应。从1907年到1911年，同盟会曾先后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及江浙等地，发动了多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没

有成功，但它們打击了清朝的統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清革命情緒，使清政府处于朝不保夕的动摇状态下。

与此同时，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組織，繼承“日知会”的革命傳統，深入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傳組織工作。經過这些組織积年累月的努力，革命不仅在新軍和会党中迅速发展，而且逐漸伸展到中下层群众中去，为武昌起义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应当指出，当时革命派的活动并没有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結合起来。农民出身的清朝兵士中有部分人受了革命影响，包含着农民成份的会党也有参加革命的，但整个說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沒有足够地認識到广大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沒有去依靠、領導遍及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以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这是革命派的最大弱点，也是他們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

(2) 席卷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风潮

和同盟会領導的有組織的革命运动同时，由于清政府穷凶极恶的搜刮政策，全国各地也发生了群众自发性反对苛捐杂稅和飢民搶粮的斗争。仅1910年就发生飢民暴动达八十次，抗捐暴动达三十次之多。長沙群众的“搶米”风潮和山东萊阳群众的抗捐抗稅斗争，就是当时无数次斗争中規模較大、也較突出的两次。它們显示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人民群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清朝反动統治者也不能照旧統治下去了。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綫国有”，接着，又大借外債，把铁路和国家的权利出卖給帝国主义。这一反动美国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发生了保路风潮。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四) 辛亥革命

I 教法建議

关于辛亥革命的經過，为了突出重点，增强教学的思想性，可以采用下面的两个标题来讲。第一，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第二，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失敗。

讲“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简单叙述革命迅速发展和中华民国誕生的过程后，可即着重介紹各地新軍和人民群众响应和拥护革命的史实，通过这些具体史实的讲述，使学生知道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自发性的民变和兵变，以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拥

护革命，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从而認識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接着說明革命迅速发展中的危机——立宪派的投机和搶夺革命果实。指出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不利用革命形势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反而把革命政权交給了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清朝軍官黎元洪和立宪党人湯化龙。其他地方也同样被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和清朝官僚夺去了革命的軍政大权，使革命政权一步步变质，最后导致失敗。通过这些事实，可以充分說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軟弱性和妥协性。

“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失敗”一标题下，主要讲帝国主义如何干涉中国革命，如何支持袁世凱竊夺革命果实的事实，使学生認識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死敌和它們的凶恶面目；对它們不能存有任何幻想，要想革命胜利，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驅逐出中国。这一段教学，要繼續揭露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軟弱性和妥协性。

最后讲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讲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既肯定它的功績和作用，一方面要明确指出它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所以归根結底它是失敗了。

至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如果在讲革命經過时讲得清楚，学生当能認識到这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軟弱性和妥协性造成的，在此，我們还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这种阶级特性。要联系旧知識，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說明它产生于中国已淪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千絲万縷的关系；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始終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靠，也不能斬断与封建剝削的联系，因而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領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領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教育学生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問題。

II 教材分析

(1) 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

1911年4月发生了保路风潮。9月，四川的保路风潮发展为武装起义。清政府調派湖北新軍前去鎮压。10月10日晚，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經一个晚上的战斗就占据了武昌。第二天成立了革命政权——軍政府，起义取得胜利。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紛紛响应，先后宣告独

立。到11月底，为时仅一个多月，全国絕大多數省分都宣布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清政府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11月初，独立各省代表开始商討組織中央政府。12月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接着成立了参議院，組織临时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誕生。統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終結了。

1. 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

第一，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武装斗争，打击了清朝的統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創造了条件。文学社、共进社等革命团体在湖北新軍中的宣傳組織活动，为武昌起义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是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二，各地新軍的起义，也是革命迅速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軍士兵大都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出身，对清政府充滿着仇恨，有反抗封建統治的要求，他們很快就接受了从軍的革命党人所宣傳的反滿革命思想，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对新軍士兵曾加防范，收繳了他們的武器。武昌起义后，各省为了鎮压革命，把枪械子彈发給士兵，新軍士兵一領到枪械，就立刻起义了。如陝西、山西、云南等省就是如此。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各地富紳巨商、立宪党人和清朝官吏的見风轉舵投机革命，也是革命迅速胜利的因素之一。

第三，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革命，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武昌起义后，軍政府决定招募新兵。农民、工人和退伍士兵踊跃参军，五天就招滿了四协（四旅），应募者仍源源不絕。当革命軍与清軍在汉口附近作战时，革命士兵勇猛冲鋒，附近老百姓拿起鋤头、扁担助战，杀得清軍落花流水。在汉阳失守的时候，清軍一到，当地人民就逃避一空，拒絕帮助清軍，而一聞民軍各部队派人到四乡招募新兵，民众就踊跃参军。乡村男女老幼紛紛向招募人員打听消息，聞民軍胜則喜，聞敗則恨。他們的喜怒哀乐，都在民軍一边。

革命导师列宁曾說：“如果没有群众底巨大的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漲，中国民主主义就不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取得共和国。”

2. 立宪派趁机搶夺革命果实

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革命党人的軟弱，未能

乘机发动群众繼續进行革命，而把革命政权的軍、政领导地位，交給了清政府的旧軍官黎元洪和拥护君主立宪的政客湖北諮議局的議長湯化龙，想借他們的“資望”作号召。革命政权遂为这些与革命无关或向革命投机的人所盘据，革命党人自动放弃了革命的領導权。

其他各地的立宪党人与士紳富商，害怕激烈的革命斗争，眼看清政府的复亡已成事实，便見风轉舵地附和革命，宣布他們一向是主張共和、贊成革命的。而且搶先一步，劝告当地的清朝官吏自动宣布独立；再推举几个立宪党人、地方士紳和在当地活动的革命党人参加政府工作。这样，原来的清朝官吏便成了新政府的首脑，立宪党人便在新政府里占据了重要位置。各省軍政府的都督不是原来的巡撫、統制、协統，就是立宪党的諮議局議長。江苏、貴州、广西、广东等省就是典型的例子。魯迅对光复后的绍兴的描写，“滿眼是白旗，然面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而还是几个旧乡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就是当时新政权的写照。

当时革命党人被迅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求赶快結束革命，把这种協議分脏的形式看成是革命成功的捷徑，竟与清朝官吏和立宪党人妥协，并把革命政权的領導权交給了他們，这就是使革命政权一步步褪色，最后为反动势力利用并与袁世凱为首的反动势力合流，使革命陷于失敗。

（2）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失敗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惊慌失措，被迫起用已被革职的北洋軍閥袁世凱，把軍政大权交給他。袁世凱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繼承了李鴻章的衣鉢，是中国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看到了清政府的无能和革命党的軟弱，便乘机用两面要挟的手段夺取政权，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向革命进攻。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足够的認識，当集中火力进攻清政府时，对于帝国主义者显示了毫不設防的天真态度。武昌起义后各省成立的政权，都表示遵重各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特权，采取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方針，幻想帝国主义者做中国革命的朋友。这样，就使帝国主义者得以用更狡猾的方法干涉中国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德、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已答应清朝湖广总督的請求，准备武装干涉中国革

命；但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如此迅速，清政府应付革命的惊慌失措的情形，又使帝国主义者失去对它的信心；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革命党对外是妥协的，并不可怕，他们乃宣布“严守中立”。但在“中立”的幌子下，积极进行着进攻中国革命的阴谋。

革命发生后，许多沿海口岸树立了革命的旗帜，这些口岸海关的洋税务司立刻截留全部关税，不给革命政府一点钱。而在北方港口的洋税务司，却仍旧和清政府合作处理关税，把相当数目的税款交给清政府。袁世凯上台后，帝国主义者认为扶植袁世凯来代替清政府对它们会更有利，于是便积极支持袁世凯进行反革命的阴谋。为支持袁世凯，四国银行团贷款三百一十两给清政府。德国公开把军火卖给清政府。帝国主义者并企图通过和谈让袁世凯掌握全国政权。

11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刚到汉口，英国领事就把英国公使提出的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和谈条件转告代表。各国公使向南北方代表提出警告，说中国“内乱”延长，将危及外国的利益及外人的生命财产，希望和谈早日完成，勿使战事拖延。于是在帝国主义者干涉下和谈于12月开始。革命党方面看不清帝国主义者和袁世凯的阴谋，盲目乐观地幻想着革命的全部胜利，开始走上与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

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加紧卖国，把灤州煤矿交给英国人办；答应关税由外国人支配。帝国主义除继续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外，英日军舰集中长江，日俄军队活动于东北。它们还威胁说：如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立宪派也叫嚣“勿扰商”，在财政上打击临时政府。袁世凯系统下的军阀官僚齐集南北相持，外国干涉的危险迫在眼前。革命阵营内也有好多人认为如果不向袁世凯全盘让步，立刻就会遭遇亡国的危险。他们迷信袁世凯的地位和武力，害怕长期斗争，只想采取妥协的方法迅速取得胜利。当时孙中山对妥协曾表示不满。他说，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就谈不上什么和谈。但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立宪派的逼迫下，不去依靠广大的民众坚持斗争，最后只有牺牲革命的目的而与反动势力妥协。

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妥协派的压力下，孙中山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誓守参议院所定的宪法，参议院就选袁世凯为

临时总统。袁世凯听到这些条件后，看到只要逼迫清帝退位，他就可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夺得政权，于是逼迫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致电南京政府声明拥护共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接着制订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

孙中山等人对袁世凯是放心不下的，所以孙中山坚持以南京为国都，以为调虎离山之计；并主张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想借约法约束袁世凯。但最后的一次努力——争都问题也失败了。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参议院和政府迁到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反革命“统一”了南北。经过长期努力而争得的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在妥协中失败了。

(3)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1.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是推翻了二百六十多年来的满洲贵族的统治，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基本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制度，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后来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就在全国的反对中进入棺材。张勳想拥“溥仪复辟”，也只演了十三天的“复辟丑剧”，就草草收场。

2.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两项任务，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座大山，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归根结底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

辛亥革命中，帝国主义者扶助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压迫革命党向袁世凯妥协；掌握各省军政府政权的军阀、官僚和立宪派绅士，也是袁世凯在革命内部的代理人。外来的帝国主义与内在的反动势力联成一气，一齐向革命进攻，成为阻碍和绞杀革命的强大敌人。

至于革命力量太弱，则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

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始终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同时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下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正确认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没有去动员组织广大的人民，就是对当时已经起来的群众斗争——抗捐税运动、保路风潮等，也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领导。所以当官僚、政客、立宪派人士以及革命派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一起压迫、包围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时，革命派领袖们回顾自己

背后，没有可靠的群众力量，就只能向反革命势力投降了。

3.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教训：第一，人们觉悟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不但不能对帝国主义寄予幻想，而且必须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第二，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中国工人阶级跃登历史舞台后，在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中国四十多年革命所走的道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对中国古代史教学进行 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江苏省苏州高中

陶念慈

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说：“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斗争）。”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就历史教师来讲，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就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教师把兴无灭资的政治方向贯串在丰富的历史教材里成为教材的灵魂。因而，贯彻四个观点问题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也就是教师自我改造的过程。

但是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是党和政府对各类学校、各种学科提出的共同任务，历史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史与其他学科的性质、任务不同，贯彻四个观点的方法、途径也不同。如何根据中国古代史的特点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我在一年来的教

学中做了一些努力，初步摸到一些途径，提出来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阶级观点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页）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农民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真理。因此，以阶级观点把每次农民阶级斗争作为重点讲授的内容，是完全必要的。

在农民阶级斗争教材中贯彻阶级观点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具体阐明每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特点和作用。

我在讲秦末农民战争、绿林、赤眉起义和黄巾起义过程中，都具体地讲述了每次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它的特点和作用。根据后来的考查，同学一般都掌握了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1）三次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不同。秦末农民战争是反对秦帝国沉重的租税徭役和严酷的法律；绿林、赤眉起义是反抗地主兼并土地；黄巾起义是反抗大地主对土地的侵占和政府的横征暴敛。

(2) 三次起义的组织成份一次比一次单纯, 战斗一次比一次英勇, 作用一次比一次深刻; 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 阶级压迫的具体情况不同。

(3) 三次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不同, 但对统治阶级的打击是共同的。如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措施中以减轻徭役、租赋为主; 刘秀取消了农民的军事训练制度和征调农民服兵役的办法, 并实行了解放奴婢、赦免罪人和兴修水利等措施; 东汉政权的崩溃, 地主割据势力的扩大, 都是农民阶级斗争给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和农民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反映。这样, 就纠正了少数同学认为“中国古代史有一套公式, 即统治阶级如何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 农民如何起来反抗”的模糊认识, 清除了“天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残余影响。

(二) 阐明农民不仅是阶级斗争中的主要力量, 也是民族斗争中的伟大支柱。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 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复杂起来。但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情况下, 为挽救民族危亡贡献出伟大力量的仍是农民阶级。我在讲八字军、红袄军的抗金斗争时, 向同学强调指出: 他们的斗争不仅牵制了大量的金军, 阻止他们继续向南方侵略, 而且保卫了长江以南人民的生活, 使南方的经济能够发展、繁荣起来, 在讲钟相、杨么起义和明末农民战争时, 强调指出杨么曾两次拒绝伪齐联合攻宋的利诱, 并要求南宋政府停止对人民的战争, 共同抗金。李自成进军到居庸关时会派人见崇祯皇帝提出联兵抗清主张, 曾招抚吴三桂共同抗清。这都是农民阶级热爱祖国, 在民族危亡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 而封建统治阶级, 在民族敌人面前不是妥协投降, 便是为虎作伥。这些也说明了农民不仅是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 也是反抗外族侵入的伟大支柱。

(三) 阐明随着农民阶级斗争的发展, 农民阶级斗争的经验更加丰富, 基础也更加雄厚了。

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的, 但是农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他们阶级斗争的经验不断地丰富了, 基础也逐渐雄厚了。如讲钟相杨么起义时, 我就向同学指出: “等贵贱, 均贫富”口号的提出, 不仅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更团结了洞庭湖周围千百万农民坚持了反抗南宋和伪齐政权的斗争, 他们一面

生产、一面战斗, 不仅是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 也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有利条件打击统治阶级的重要战术。讲明末农民战争时, 更着重说明三路防御、一路出击的作战计划, “均田”、“免赋”、“平买平卖、蠲免钱粮”的斗争纲领和“以走敌”的游击战术, 都是起义首领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提出来的, 都起了壮大起义军队、瓦解统治阶级力量的作用, 表明了随着农民阶级斗争的发展, 农民阶级斗争的经验是更加丰富了, 基础也更加雄厚了。

以上是在讲述农民阶级斗争教材中进行阶级观点教育的一些途径。另外, 讲述统治阶级的政治措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历史人物和文化思想也都应该贯彻阶级观点的。如讲两税法以后, 我向同学指出: 新税法在实行之初, 曾起了增加政府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后来, 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严重了, 结果激起了唐末农民战争。尽管唐末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讲清两税法的性质、内容, 就不能完整地阐明唐末农民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在讲东林党人的反宦官斗争以后, 指出, 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的情况下, 这种反对宦官把持政治、反对宦官对工商业者掠夺的斗争, 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让同学明确了斗争的作用, 就能理解明末腐朽政治对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阻碍, 就能正确认识市民反矿监税监斗争为什么是我国历史上的新现象。统治阶级的措施是阶级剥削的重要手段; 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会直接影响敌对阶级之间矛盾的发展。因此, 也都是贯彻阶级观点教育的重要方面。

就历史人物和文化思想来讲, 也是为阶级意识、阶级力量所支配和限制的。如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时, 我一方面指出他介绍大量西方国家文化、科学、技术, 总结补充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的经验, 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化、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另一方面也指出: 在明末腐朽的政权统治之下, 他所能起的作用毕竟是有限度的。这样, 就揭露了阶级社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罪恶, 指出消灭阶级的重要意义。因而, 讲历史人物和文化思想也是不能与阶级观点割裂的。

二 群众观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社会不断地前进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前仆后继, 英

勇战斗的结果。因此，在讲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是有丰富内容的。

(一) 从阶级斗争中阐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任何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巩固延续它的反动统治政权的，但不管它的面貌如何凶恶，手段如何毒辣，总是逃不脱人民的打击，最后必定失败以至灭亡的。我在讲元末农民战争的意义时，就指出元的统治是极其残酷的。它用四等分化政策、编制探马赤军办法削弱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力量，维持加强它的统治政权。但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毕竟是无穷的，韩山童、刘福通利用宗教组织形式团结群众，利用河工集会时机动员广大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元斗争，结果三路北伐，沉重地打击了元的统治基础，并为南方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样，在民族斗争中，统治阶级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讲东晋恢复中原和保卫江南的斗争时，强调指出祖逖的北伐军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才收复了被石勒占据的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谢玄、谢石能以八万士兵战胜拥有八万多步兵骑兵的苻坚，也是由于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士兵英勇作战的结果。战争的胜败是取决于战争性质的，但最能辨别战争性质的是人民群众，苻坚就是因为他的军队中大部分汉人不愿意作战而迅速溃败的。这就教育同学认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的真理。

(二) 从生产斗争中阐明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贡献。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有高度文化、高度科学技术的国家，只是近百年来在国内外反动派的压迫、掠夺下才变成“一穷二白”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不仅文化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人类也只有停滞死亡。因而运用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的贡献进行群众观点教育是必要的。如讲明代手工工场的出现表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一问题时，我就指出这是生产发展中的重大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而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是由于广大农民、工匠辛勤劳动的结果。再如讲贾思勰的“齐民要

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时，指出他们都是总结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以后才编写这些著作的。知识离开人民群众是不能积累的，知识分子离开劳动人民也是一事无成的。为了教育同学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在讲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时，特别强调了他在长途旅行中访问了农民、渔人、樵夫，并拜他们为师的精神，指出正因为他以人民群众为师，他的医药知识才得到丰富，才有了编写“本草纲目”的基础，成为中外景仰的伟大的科学家。

(三) 从英雄人物的活动阐明个人与群众的正确关系。

历史上任何英雄人物的成就都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如讲郑和远航以后，我提问同学：郑和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就？同学回答说：是由于罗盘针的发明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我给他做一些补充：郑和远航是一个空前的壮举，但他需要雄厚的财力作基础，而这正是广大农民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否则，郑和也组织不了那样规模庞大的舰队。罗盘针的发明，造船技术的提高，也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不仅联系了过去的知识，而且纠正了同学见物不见人的看法。再如讲岳飞、戚继光时，也指出由于他们的活动与人民的利益一致；由于他们能联系人民力量，由于他们的军队有严明的纪律，因而才在人民的支持下不断地取得了胜利。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贯彻群众观点，可以使同学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是最深厚的，培养同学树立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三 劳动观点

毛主席指示我们：“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5页）根据这些指示，结合教材内容，我认为贯彻劳动观点的主要途径是：

(一) 阐明劳动人民对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

会发展的贡献。

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一般同学是有些认识的。但如何根据教材内容具体地讲清楚，避免概念化，仍是我們应该考虑的问题。我在讲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这部分教材时，先问同学春秋时期冶铁技术改进的情况和它的影响，然后讲战国时期冶铁事业的发展及其促进社会经济面貌变化的情况，最后指出劳动人民在冶铁事业中的成就是推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为促进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为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提供了条件。因此，冶铁事业的发展程度不仅决定着劳动人民在农业、手工业劳动成就的大小，而且关系着社会性质变化的快慢。

(二) 颂扬劳动人民在文化、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6—617页）根据这些指示和教材内容，充分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在文化、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and 我国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及其影响，对增强同学爱国主义思想、鼓舞向科学进军的热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都是有益的。

(三) 阐明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措施是农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历次农民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多少总要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实行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措施。具体地讲述这些措施才能充分说明劳动人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我在讲完唐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节以后，向同学提出：唐帝国所以成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唐初统治阶级接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对农民实行了各种让步措施的结果。没有那些让步措施，就没有唐帝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那样雄厚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成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唐帝国的繁荣是隋末农民战争胜利

成果的反映。这样，可以加深同学具体理解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从而增强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认为通过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劳动观点的教育也是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结合生产劳动的途径。

四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我是从下列两个主要方面培养同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

(一) 根据时间、地点、条件具体地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

中国古代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很多，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来培养同学具体分析历史事件、人物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在我讲了隋朝的经济和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同学对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作用与他的暴政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全面。有的同学认为运河对当时和以后促进南北经济交流是有利的，是不是应列为暴政？通过讨论和启发，明确了这条运河的开凿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东南东北地区的统治力量，为了更有利于榨取吮吸人民的财富和运输军队，以至便于他的“巡幸”，因此，应该说开凿运河是他的暴政的一个方面。又如有的同学对岳飞曾经镇压钟相、杨么起义，为什么还被称为民族英雄不够理解。通过讨论也明确了当时的抗金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重大问题；岳飞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国家的生存，联系人民力量英勇杀敌，是完全符合人民要求和愿望的，这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方面；镇压钟相、杨么起义是他的缺点，不能因为他有缺点就否定他的主要成就。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人物的讨论分析，很有助于提高同学全面观察事物的能力。

(二) 阐明经济和政治、文化间的关系。

我在讲述每个时期的文化史以前，都以提问、讨论的方式让同学明确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特点，然后再讲新课。这是有助于同学正确地理解经济和政治、文化间的关系的。一位同学在回答“隋唐文化繁荣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总的讲来，是由于隋，特别是唐，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由于国际通道的开辟，使文化科学交流频繁，互相推动促进，形成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

文化和科学是产生和发展于劳动人民群众中的，它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唐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让步的措施，结果，经济非常繁荣，也就形成了文化的繁荣。如敦煌壁画和吴道子的画都是描写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繁荣的。由于唐代中期以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痛苦，也产生了爱国诗人的名作，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由于唐帝国是统一的，文化交流很方便；还有国际通道的开辟对文化的繁荣也起了促进作用，如长安的塔是吸取印度建筑技术造成的。

因而，文化科学的发展，总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这证明同学对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 × ×

以上是我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一些做法。此外，谈谈我在实践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一）四个基本观点的教育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同一教材往往可以同时进行几个观点的教育。如钟相、杨么起义既包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内容，又有制造“车船”和岳飞的镇压等问题；这里既要统一贯彻四个观点，又要根据教材内容分清主要次要，本质非本质。因此，要提高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水平，首先要不断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武装自己，才能深入理解教材，防止片面化简单化。

（二）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要从教材的内容出发，使观点与教材统一，要抓住教材里最本质的问题，最主要的内容，运用正确的观点进行分析归纳。如阶级观点，不仅要在讲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贯彻，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措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历史人物、文化思想中也都应该贯彻。如果不从教材的内容、教育的目的出发，便会产生偶然凑合、随意类比的情况。因此，必须刻苦钻研教材，挖掘教材的思想性。

（三）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还必须从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出发。历史学是一门有严格科学性系统性的社会科学，其中某些内容与今天的政治和生活是有联系的，但贯彻任何观点也不应破坏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上接第23页）

“四海之内，其帆檣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陵削其精华”（卷五二）。这是从本质上对英国资本主义侵略性的描述。他介绍外国使用公元说：“欧罗巴诸国纪年皆称一千八百几十年，非其传国之年数也，各国皆奉耶稣教，以耶稣降生之年为元年，至今凡一千八百余年耳。”（卷三七）这也是与事实相符的介绍。此外，他又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沿革、风俗以及船炮的制法和民用品的种类等等。所有这些知识的介绍，对于当时确如魏源所说：“直可扩万古之心胸”。

总之，“海国图志”在当时“实为国人自编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对于当时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它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俱传入日本，发生极大影响”（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而其在国内之影响尤在徐书之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的思想和论点被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分别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吸取。洋务派的左宗棠自承体现了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他在为“海国图志”重刻本所作序中曾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随中有华匠制鎗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壹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但，这是一种歪曲的继承，因为洋务派的设厂仿造，实质上是企图以新式武器来屠杀人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与魏源及其后继者的为抵抗侵略而要求学习和改革的思想是有所区别的。真正继承魏源进步思想方面的是维新派。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到魏源“海国图志”中若干论点所起的影响。稍后的冯桂芬在其主要作品“校邠廬抗議”中，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必须能“自造、自修、自用”，反对“购船雇人”（制洋器议）。这就是魏源“不仰赖于外夷”思想的继续。另一个维新派分子主翰曾编著“四溟补乘”一百二十卷，自称是继魏源“海国图志”而更加完备的一部大书。魏源对于外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也开后郑观应、陈澧等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先声。魏源在“海国图志”和另一些著作中所提出的开矿、铸币、造船、练兵等事，也为以后的维新派所继承。马建忠的“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富民说”，“适可斋纪言纪行”），以及康有为的富国之法六：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公车上书”），等等，都是魏源初期维新思想的一脉相承而有所发展的表现。

問題解答

問：明末苛重的“三餉”加派是哪三餉，是怎样加派的？

答：明朝末期，政治腐敗，災荒頻仍，民不聊生，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1550年（嘉靖29年）俺答犯京師，增兵設戍，開支超過以前一倍多。次年京邊歲用達五百九十五萬石（“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二）。戶部尚書孫應奎提議在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120萬，這是加派的開始。從此有例可援，就有了“三餉”的加派，“三餉”就是遼餉、剿餉、練餉。

一、遼餉。明末對遼東用兵，軍餉激增至300萬兩，1618年（萬曆46年）戶部以遼餉缺乏，除京畿八府及貴州外令全國加征田賦，每畝加三厘五毫，共派額銀二百萬兩有奇，這是第一次遼餉加派；1619年12月再加天下田賦，于舊加外，復加三厘五毫，計增二百萬有奇，這是第二次遼餉加派；1620年3月復加天下田賦，畝再加二厘，這是第三次遼餉加派；連前三次加派共增九厘，賦五百二十萬兩，每年就根據這一定額來征收。1630年（崇禎三年），袁崇煥因皇太極行反間計及其他緣由被殺，此後，皇太極對明的侵擾更為頻繁，國防消耗增加，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充餉，“乃于九厘外，畝復征三厘，……共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余萬”（“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二），這是第四次遼餉的加派。

二、剿餉。1627年（天啟七年）掙扎在死亡綫上的陝西飢民，以王二為首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其後陝西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不久即成為燎原之勢。明統治者為了鎮壓農民起義軍，1637年（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他計劃以這十面之網來消滅起義軍，建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崇禎依議布告天下增賦，這就是剿餉。

關於剿餉加派的辦法和數額，“明史”卷七十八食貨二記得很簡單：“復行均輸法，因糧輸餉，畝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征一分四厘九絲。”龍文彬在編纂“明會要”時，對於剿餉，也只編入一條不全面的材料：“十年三月，楊嗣昌督師，請行‘因糧’法，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折銀八錢，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帝改‘因糧’為‘均輸’。”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36明末遼餉剿餉練餉一段中，也只簡略地提到：“十年楊嗣昌又請增二百八十萬，舊額之糧，每畝加六合，石折銀八錢。”這幾段材料皆過於含混。比較清楚詳細的是“明史”楊嗣昌傳的記載：“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遞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隨後又說：“其改因糧為均輸”。

三、練餉。征收剿餉時，原議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起義軍的聲勢愈來愈大，1639年（崇禎十二年）明廷又計議各鎮抽練額兵總共七十三萬，於是除剿餉外，“復畝加練餉銀一分，共增七百三十萬兩。

從萬曆到崇禎，三餉加派每年共增賦一千六九十五萬兩。因着三餉的加派，使民窮財盡。如原無遼餉時，農民所收穫的糧食，一半納糧，一半糊口；有了遼餉，一半納糧，一半充餉，人民就只有空着肚子。陝甘一帶人民因着遼餉的催迫，“百里內人烟斷絕，官府就現有民戶催迫糧餉，富戶變成貧戶，也棄家逃亡”。1641年左懋第督催漕運，從靜海到臨清，沿途滿目淒涼，他親見人民餓死的有十分之三，瘟疫而喪失生命的有十分之三，參加起義的有十分之四；一石米24兩銀子，河南更昂貴，一石米一百五十兩銀子，人死後，死屍被分食。他上疏說：“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于野，商嘆于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剿賊御邊，效果安在？奈何使眾心瓦解，一至此極乎？”（“明史”卷275左懋第傳）由此可見三餉的加派更加深了明末社會的矛盾。這一問題對於我們理解當時的階級關係、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生活情況，是有幫助的。（王瑞明）

問：1926年北伐時汀泗橋、賀勝橋兩次戰役的簡

單經過是怎樣的？

答：汀泗橋和賀勝橋兩次戰役是北伐中極為重要的戰事，由於在這兩次戰役中，擊潰了北洋軍閥吳佩孚的主力，革命軍才迅速地進占了武漢。

汀泗橋和賀勝橋是粵漢鐵路湘鄂綫上著名的要塞，屬湖北省，地勢極為險要。汀泗橋南西北三面皆環水，東面高山聳立，僅西南端有一綫鐵路可以通過，橋長約二十丈，易守難攻，是軍事上重要的防禦陣地。吳佩孚為了阻止北伐軍前進，在汀泗橋上架設了鐵絲網，附近山水要道也都建築起堅固的防禦工事，以由湖南退却下來的朱大甯軍和後方的生力援軍陳嘉謨的一個團共二萬多人，據險堅守。吳佩孚在戰事發生後，又親率劉玉春及彭祖佑的軍官團及馬濟、姜雲鶴部之游擊隊等主力勁旅參加戰鬥。他們自以為以這樣的有利形勢和雄厚兵力，即可阻止北伐軍的進攻。

北伐軍攻占衡陽、岳州後，就向汀泗橋推進，參加這一戰鬥的有第六、七、八、四等軍和主要由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組成的獨立團。四軍為主力，獨立團為先鋒。獨立團是由葉挺同志所率領，在擊潰吳佩孚的主力軍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進攻是在8月26日發動的，第四軍的第十師和十二兩師首先投入戰鬥，但第十師的先遣部隊在還未到達柏墩時，就被泛濫的河水所擋，敵人又以強大的火力壓過來；第十二師剛走到蒲圻河，就遭到敵人的阻擊，敵人向第十師和十二師中間沖擊，隔

斷了兩師間的聯繫。在這一形勢下，葉挺同志領導的獨立團的一個營被調上來投入戰鬥，扼住了敵軍的去路，這個營與強大的占著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將近十八個小時的激戰，才使第十師和第十二師之間重新恢復了聯繫，扭轉了局面。在共同奮戰下，才得將敵人逼退到汀泗橋。接着獨立團又和敵人展開了白刃戰，將敵軍全部擊退。隨後北伐軍重新布置了力量，27日以幾個團的强大力量同時進攻，敵人腹背受敵，失去了抵抗能力，開始潰退，獨立團沖向鐵路，給敵人很大的打擊，占領了汀泗橋，并繼續向前追擊。在這一戰役中，獨立團殺傷敵人甚多，俘虜了二千多人，繳獲步槍四千多支，并獲得了其他許多戰利品。

吳佩孚在汀泗橋失敗後，就退據賀勝橋一帶，賀勝橋形勢和汀泗橋一樣，也非常險要，有山作屏障，有長的鐵橋作咽喉，吳佩孚企圖據險頑抗，親自督戰，并電孫傳芳、鄧錫如由贛邊進攻北伐軍後方，但由於獨立團進展神速，乘敵人還在部署力量，就占領了咸寧城，突破了敵人陣地，紧接着又向賀勝橋進攻。由於葉挺同志革命的堅定性和指揮的正確，由於獨立團中共產黨員的英勇作戰，又一次迅速地打垮了敵人。吳佩孚屢次手刃退將，也無力抵禦，只好逃跑，9月北伐軍直搗武昌城下，11月占有長江兩岸大部分土地，自此北伐軍威振全國，敵軍土崩瓦解，半個中國歸入革命軍手中。因為獨立團從北伐出師後，屢建奇功，在番號上隸屬四軍，所以從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後，人們就把“鐵軍”的光榮稱號贈送給這支軍隊。（今）

消息

南开大學舉行科學討論會

南开大學為了慶祝建校四十周年，於10月17日至11月1日舉行第三屆科學討論會。該校歷史系在討論會上提出的論文有：

中國古代史方面的“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國有制問題”，由鄭天挺和楊志玖二先生分別提出不同見解的論文。楊先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在南北朝之前是土地國有制，南北朝至隋唐間則為土地國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時期，隋唐以後則為私有制。鄭先生則認為，直到明朝，從“民田”這問題上來看，依然是土地國有制。

中國現代史方面，向燕生等先生作題為“我國過渡時期發展的幾個階段”的報告。他們認為，過渡時期是一個完整的時期，這時期沒有發生過根本的質變，因此不宜再劃分成若干時期；不過可以主要矛盾的發展和變化為依據，劃分為若干階段。

世界現代史方面，梁卓生等先生作“民族主權國家在爭取和平中立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論述中立政策出現的歷史條件、作用及其前途。

四年級同學根據去年深入礦井寫礦史時搜集的資料，寫出了“1922年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在中國工運史上的地位”和“1938年開灤五礦同盟罷工的歷史意義”的論文。

參加討論會的還有其他高等學校和研究機關的專家多人。

（張義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即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使工农业生产达到了并超过了解放前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样，就使我国有可能进一步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图三〕鞍山在1952年底修建完竣的基本建设三大工程之一——八号高炉外景。（王纯德摄）〔图四〕1950年开始兴建的我国第一个机械化的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的一角。（吴洛夫摄）〔图五〕解放后我国能自制成套的纺织机械。图为1951年开始修建的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纺织机械制造厂——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工人们在规模巨大的厂房内装配新式的纺织机。（项化庚摄）〔图六〕1952年底以前，在全国修复和兴建了许多大小发电站。图为一座庞大的水电站外景。（本图选自“解放军画报”1952年5月号）〔图七〕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图为从重庆开出的第一次列车到达成都车站。（孙忠靖摄）〔图八〕1950年开始修筑的康藏公路，于1952年11月20日自康定通车到昌都。（赵慎应摄）〔图九〕康藏公路上的汽车通过白雪皑皑的雀儿山向昌都前进。（赵慎应摄）〔图十〕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的互助组组员正在做“合式秧田”。（许碧华摄）〔图十一〕这是辽宁省彰武县在1950年营造的农田防护林，它已发挥了挡住风沙、保护农作物的作用。（胡伟摄）〔图十二〕解放后，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1950年冬治淮委员会成立，数百万民工和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迅速云集淮河两岸，进行紧张的勘察和修建工程。图为治淮工地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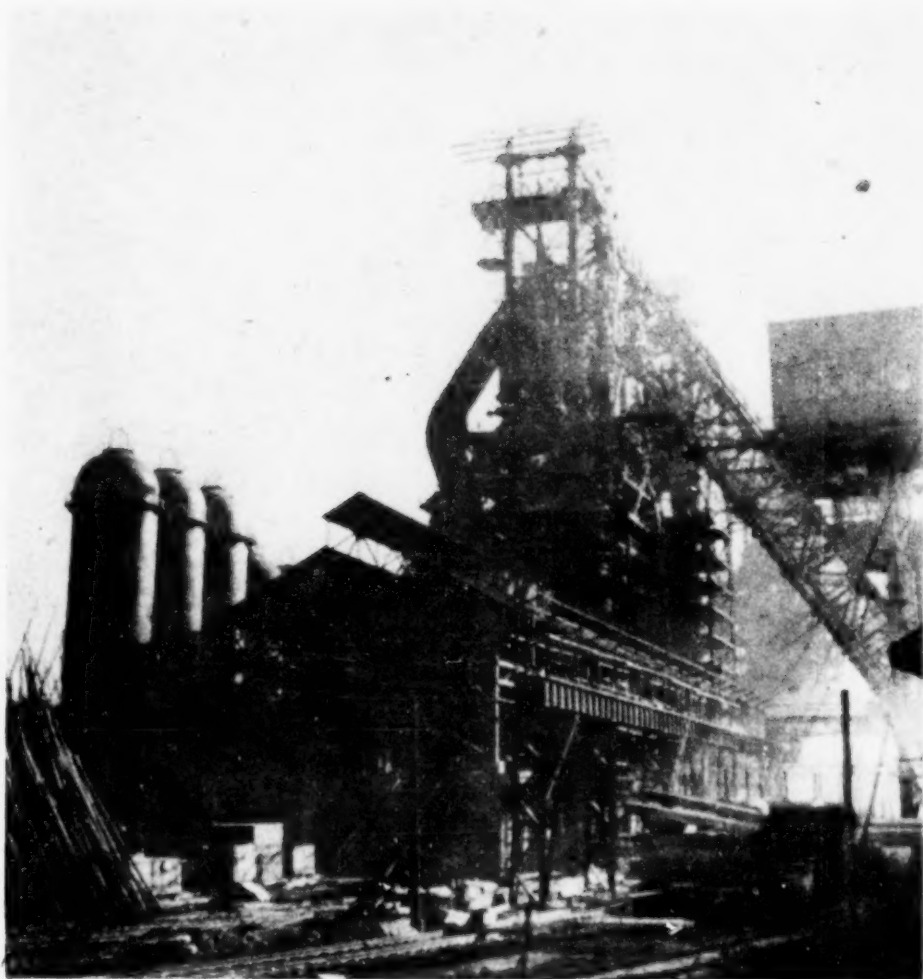


图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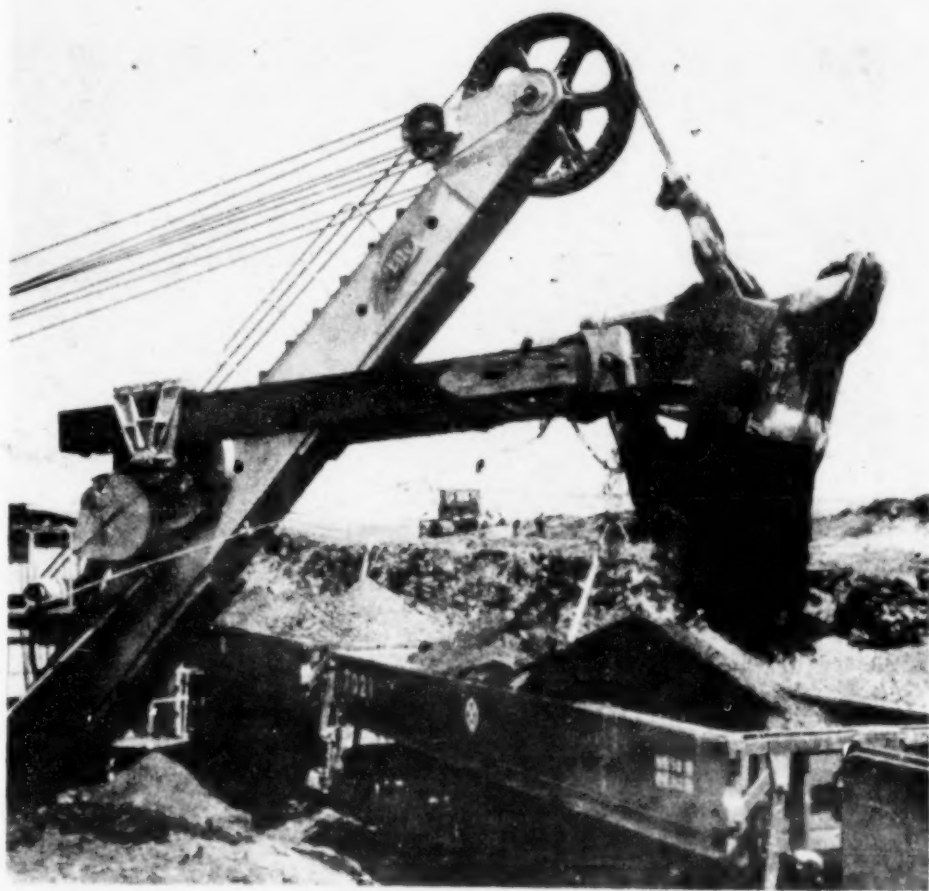


图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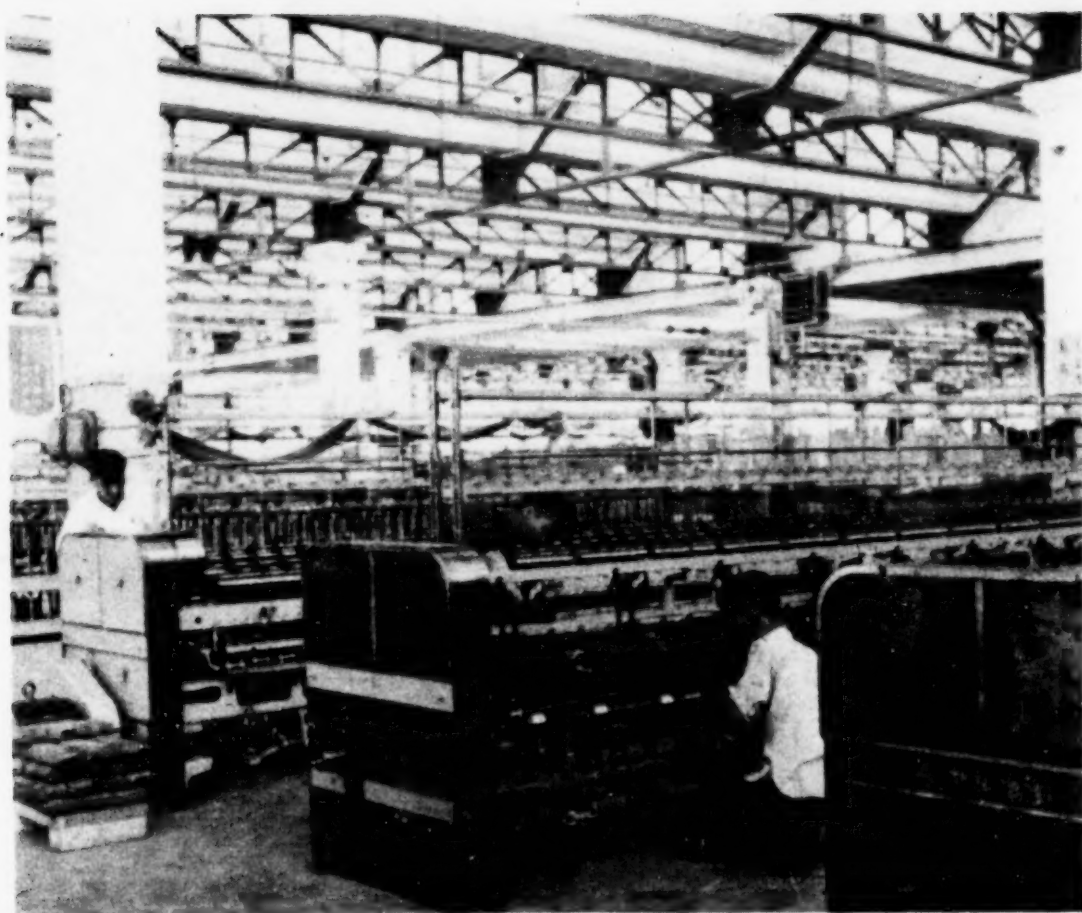


图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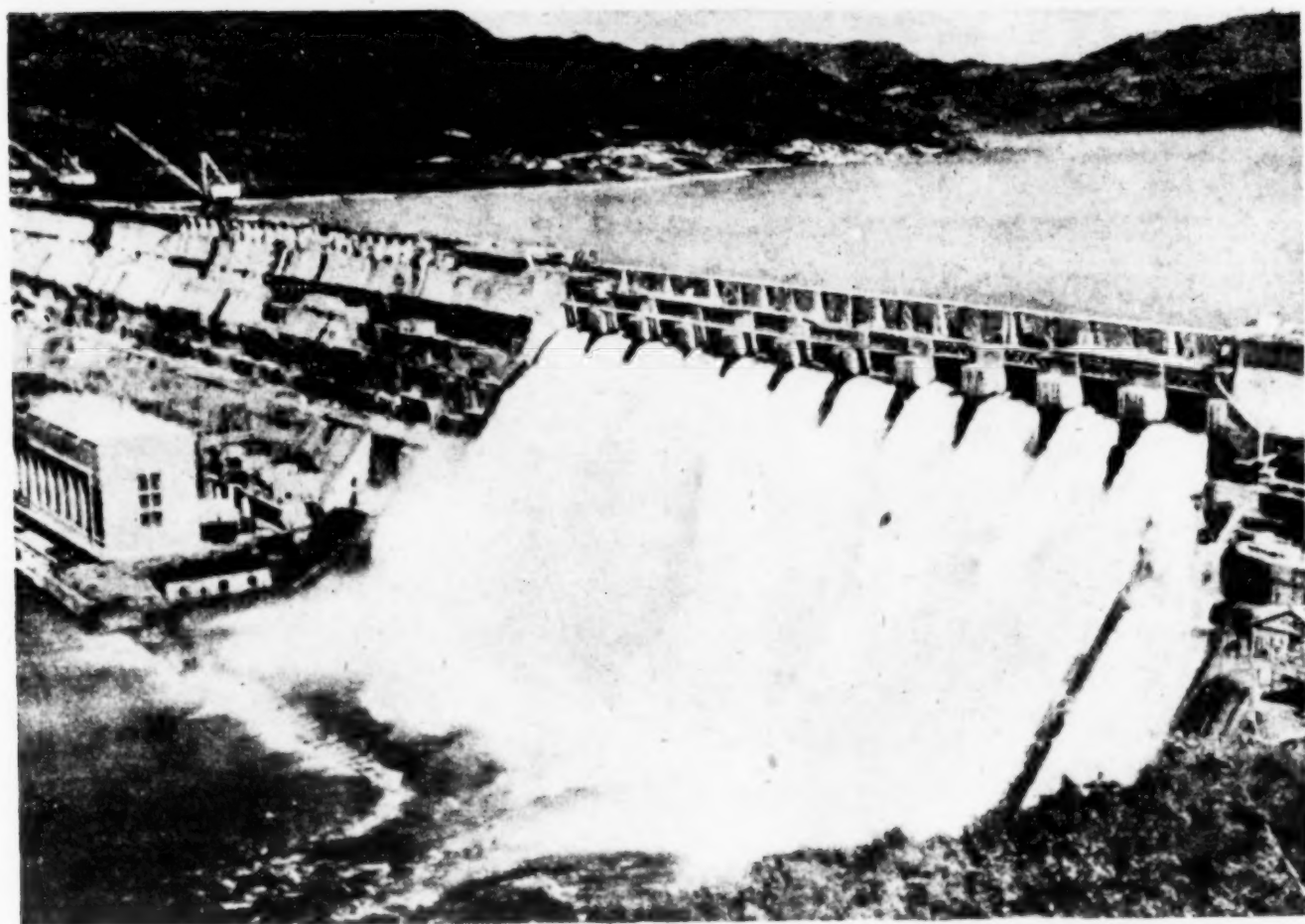


图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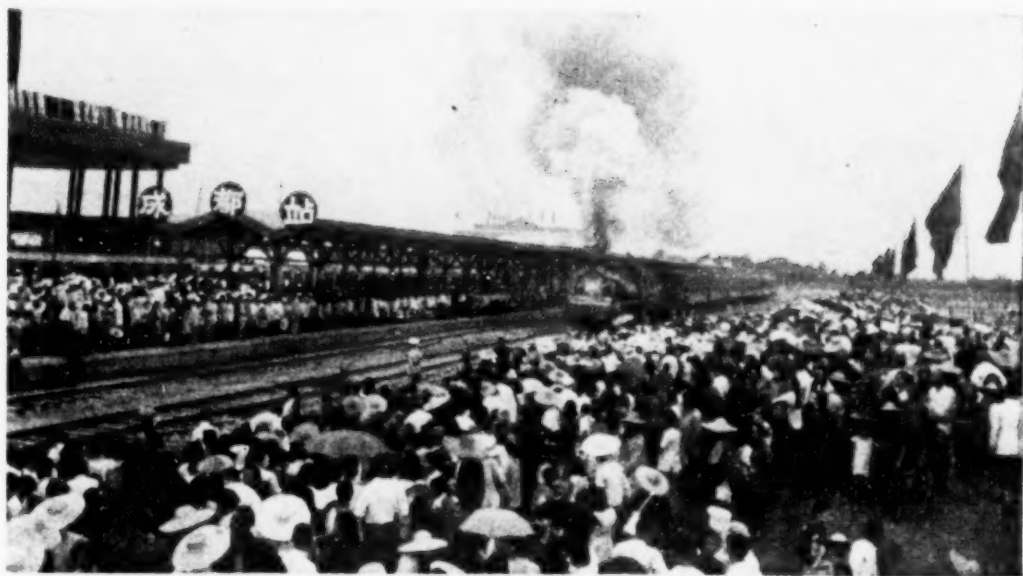


图 七



图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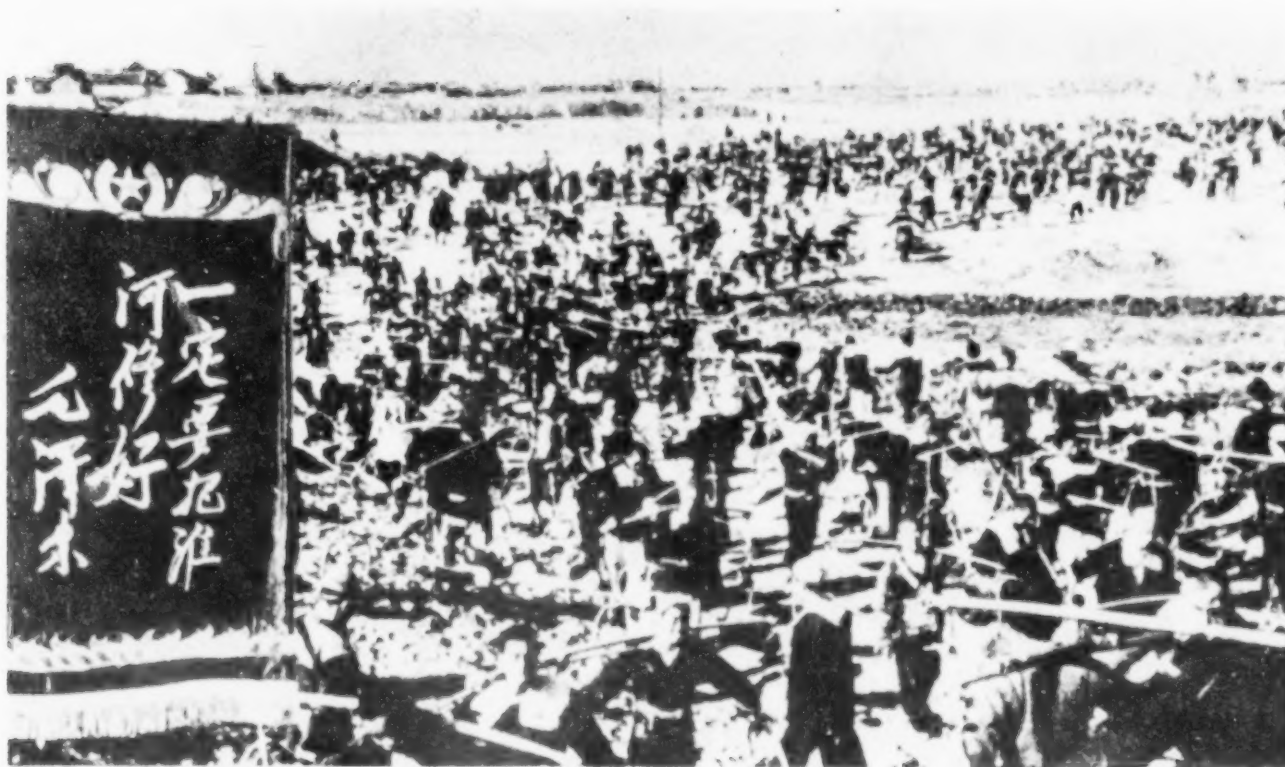
图 九

9/ Berlin W. 8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2.

1922

1922

1922